CEEM | China External Environment Monitor 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监测

总第 253 期 2023 年 3 月 1 日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经济概况

激进的环境政策

不稳定的繁荣：全球化如何使世界经济更不稳定

经济制裁：演变、后果和挑战

本期编译 郭子怡 孔祥奕 王悦人 薛懿 杨茜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　　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　　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　　弦	大宗商品
	陈　　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　　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 集 人	徐　　进		**协 调 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 慧 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曾一智 邮箱：zengyizhi@mail.bnu.edu.cn

电话：(86)10-8519 5775 传真：(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美国经济概况 6

导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门编制的《美国经济概况》旨在提供当前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关的全面概述，包括劳动力和金融市场，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以及全球经济。此外，概况还涵盖了一些特殊主题，例如商品价格走势、劳动力市场情况。本文的分析基于截至2023年2月7日的数据。

激进的环境政策 24

导读：向净零排放的过渡需要制定促进大规模碳排放转向无碳技术的政策。这种过渡往往涉及需求上的互补效应和同群效应。本文认为，在互补效应存在的情况下，需要实施变革性政策，推动社会走向绿色、低排放的平衡。政策可以包括限制高污染商品的销售、征税或逐步淘汰污染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政策来处理搭便车问题，并积极引导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其中。

不稳定的繁荣：全球化如何使世界经济更不稳定 28

导读：本文发现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导致对全球金融资产的需求增加，其结构变化增加了对具有生产价值的资产需求，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激增。全球范围内对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提高了加杠杆的意愿。一方面，这导致金融部门扩大，对实际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它增加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和后果。

主权债务危机、财政整顿和货币联盟中活跃的中央银行家 34

导读：本文在将金融稳定视为一种公共产品的假设下，研究了不完全的货币联盟中外生冲击对主权债务的影响。文章中分析认为，承诺积极的货币政策将稳定成本从受冲击的外围成员国分摊给核心国家，增强了财政纪律，从而维护整体金融稳定性，保护了各个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这一机制比严格的通胀目标机制和不干预政策更加有效。

经济制裁：演变、后果和挑战 40

导读：本文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了二战后经济制裁的演变，并反思了可以从其使用模式中吸取的教训。在这一时期，利用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情况显著增加。本文将这一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在此背景下讨论制裁的演变如何与同时代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突出特点相联系。本文对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关于制裁的文献的回顾表明，我们对制裁过程的理解可以通过结合这些文献中的观点而得到极大的提升。最后，本文确定了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和挑战，并讨论了如何利用跨学科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

本期智库介绍 61

美国经济概况

newyorkfed/文 薛懿/编译

导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门编制的《美国经济概况》旨在提供当前经济和金融发展相关的全面概述，包括劳动力和金融市场，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以及全球经济。此外，概况还涵盖了一些特殊主题，例如商品价格走势、劳动力市场情况。本文的分析基于截至 2023 年 2 月 7 日的数据。编译如下：

一. 总览

1. 第四季度的产出。

(1) 第四季度 GDP 增长强劲。

(2) 消费和库存投资是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3) 住宅投资支出严重拖累了经济增长，而私人非住宅投资支出基本不变。

2. 月度指标。

(1) 消费者支出在 10 月份跃升，但随后在 11 月和 12 月下降。

(2) 12 月，实际可支配收入继续上升。

(3) 收入增长快于支出增长，导致储蓄率上升。

(4) 12 月份制造业活动有所下降。

(5) 12 月房屋开工量相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3. 劳动力市场。

(1) 1 月份工资增速激增。

(2) 失业率降至很低的水平。

(3) 时薪的同比增速延续了自 2022 年 3 月缓慢下降的趋势。

4. 通货膨胀

(1) 12 月核心 PCE 通胀的同比增速放缓。

(2) 二手车的价格继续下降，但相比疫情前的水平仍然较高。

(3) 食品通胀已经从 2022 年上半年的高速增长回落。

（一）2022 年第四季度产出略低于疫情前的趋势路径。

1. 自 2019 年第四季度以来，GDP 的年增长率为 1.7%。

(1) 在 12 月的经济预测摘要（SEP）中，对长期 GDP 增长率的预测中值为 1.8%。

(2) 10 月份蓝筹股调查预计，2024-2028 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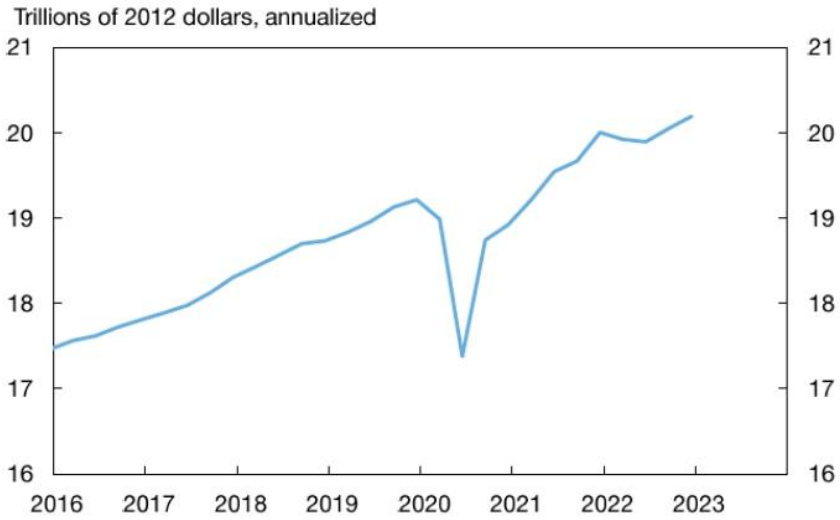
(3) 如果自 2019 年第四季度以来，GDP 增速接近长期预测值，那么当前四季度的 GDP 水平将比预期水平低了 0.50%。

2. 失业率低于长期正常水平。

(1) 1 月份 3.4%的失业率低于蓝筹股调查对 2024-2028 期间平均失业率 4.2%的预测，也低于 SEP 对长期失业率 4.0%的预测中值。

(2) 1 月的劳动力参与率比疫情前的水平低了接近 1 个百分点。

图 1 实际 GDP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

（二）1 月份失业率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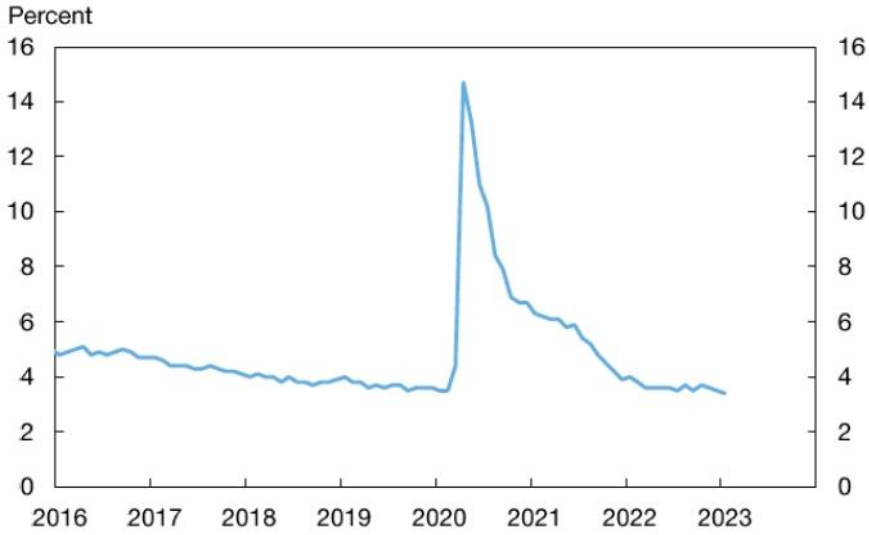
1. 失业率从 12 月份的 3.5%降至 1 月份的 3.4%，而 2022 年的平均失业率为 3.6%。

2. 劳动参与率从 12 月的 62.3%小幅升至到 1 月的 62.4%。

(1) 2019 年的劳动力参与率平均为 63.1%。

(2) 2023 年 1 月 25-54 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接近其 2019 年的平均水平。

图 2 失业率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BLS）。

（三）12 月份 PCE 通胀放缓。

1. PCE 通胀的同比增速从 11 月的 5.5%下降至 12 月的 5.0%。

(1) 食品价格上涨 11%，同时能源价格上涨 7%。

2. 核心 PCE 通胀从 11 月份的 4.7%降至 4.4%。

(1) 核心商品通胀从 3.8%降至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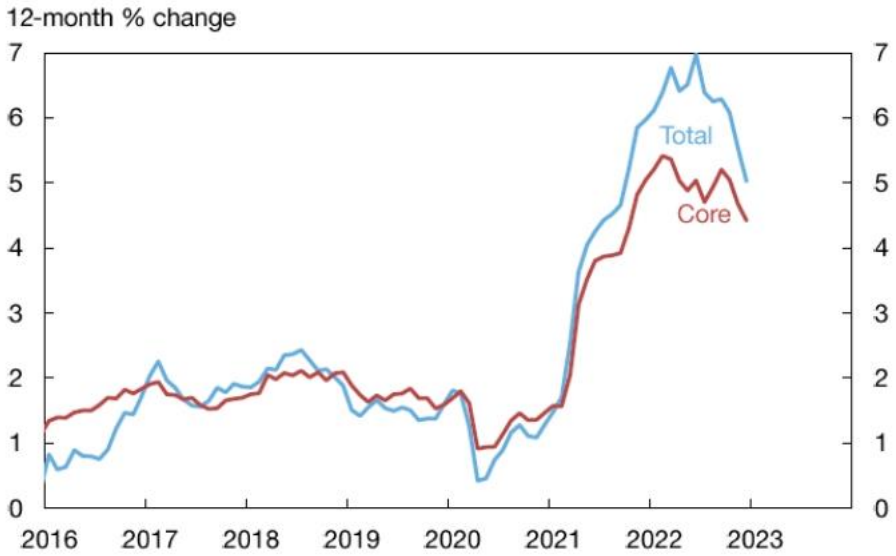
(2) 核心服务通胀从 5.0%降至 4.9%。

3. 与三个月前相比，核心 PCE 通胀从 3.6%降至 2.9%（年率）。

(1) 核心商品通胀从-0.5%下降到-0.8%。

(2) 核心服务通胀从 5.7%下降到 5.2%。

图 3 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

二. 经济活动

（一）2022 年第四季度 GDP 稳步增长。

1. 在第三季度以 3.2%的年增长率增长后，GDP 在第四季度以 2.9%的速度增长。

(1) 由于在上半年下降，2022 年 GDP 仅同比增长了 1.0%。

(2) 库存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是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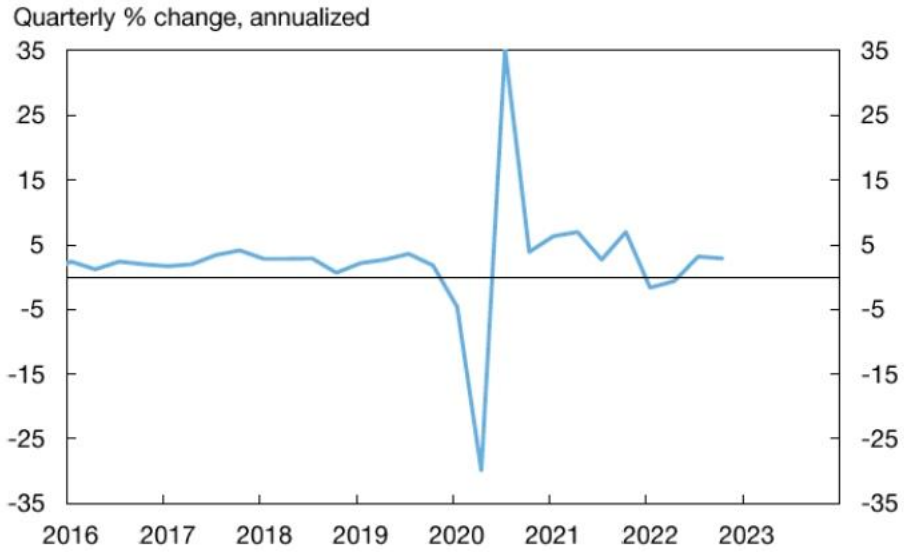
(3) 对国内私人购买者的最终销售（消费加上私人固定投资）在本季度略有上升。

2. 第四季度，实际可支配个人收入（DPI）以 3.3%的年增长率强劲增长。

(1) 2022 年实际 DPI 下降 2.3%。

(2) 个人储蓄率从第三季度的 2.7%上升到第四季度的 2.9%。

图 4 GDP 增长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

（二）制造业活动下降。

1. 12 月份制造业指数环比下降 15%（年率）。

(1) 在过去三个月，该指数下降了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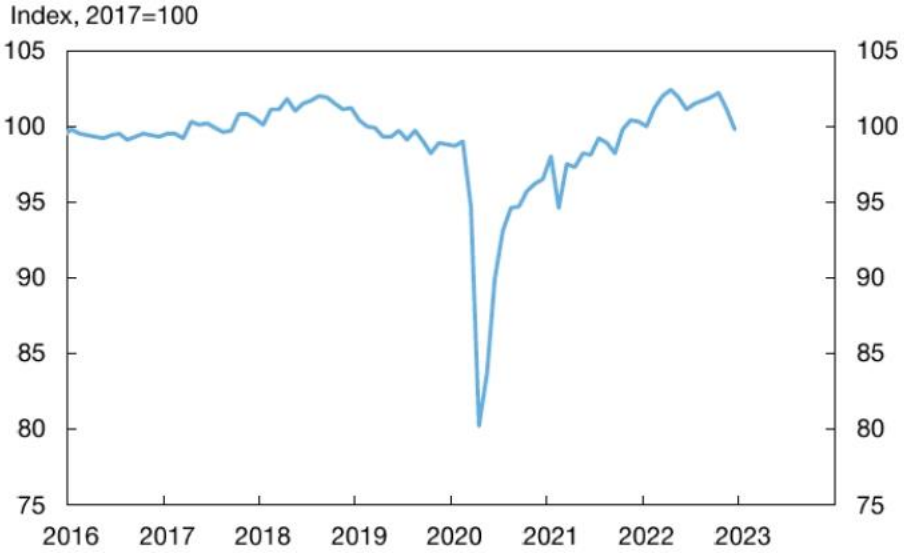
(2) 该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持平。

2. 在过去三个月，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产量均有所下降。

(1) 机械生产和炼油厂的产量都以 20%的年率下降，汽车产量则以 10%的速度下降。

3. 1 月 ISM 制造业指数下降，延续了 2021 年底稳步下降的趋势。

图 5 制造业指数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三. 家庭

（一）实际可支配收入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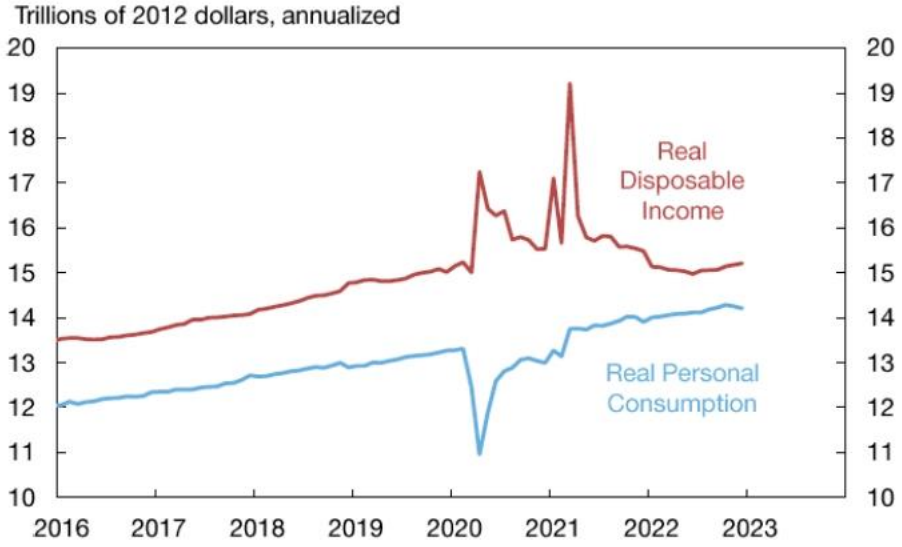
1. 12 月份名义个人收入环比上涨 3%（年率），同时实际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了 3%。

(1) 名义收入同比增长 5%，而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 2%。

2. 12 月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下降 3.4%（年率），并且同比增长 2.2%。

(1) 个人储蓄率从 11 月的 2.9%升至 12 月的 3.4%。

图 6 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二）消费者的商品支出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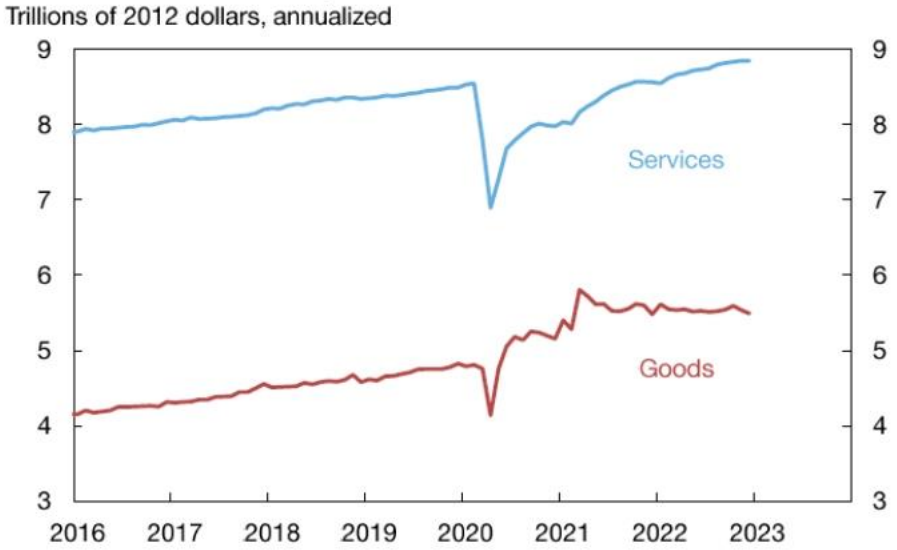
1. 实际商品支出在 12 月份环比下降 7%（年率）。

(1) 耐用品支出下降 18%，并且非耐用品支出下降 5%。

(2) 商品支出的同比增速保持不变，其中耐用品支出增长 2%，食品支出下降 5%，并且能源产品支出下降 4%。

2. 服务业的实际支出与上月持平，并且同比增长 3%。

图 7 消费者支出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

四. 商业部门

（一）2022 年第四季度设备支出下降。

1. 在第三季度强劲增长之后，实际商业设备支出在第四季度下降 3.7%（年率）。

(1) 本季度设备支出使得 GDP 年化增长率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

(2) 信息处理类别的支出大幅下降，抵消了运输类别的大幅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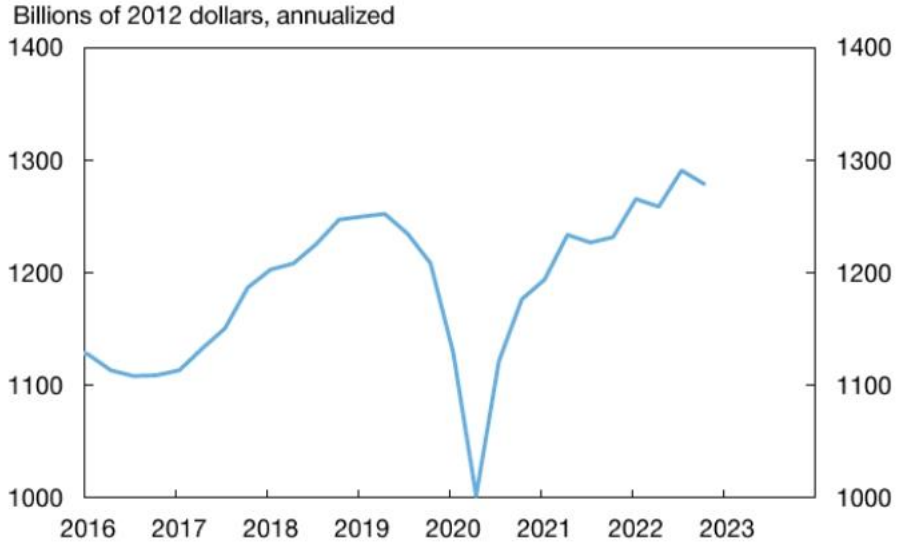
(3) 设备支出同比增长 3.8%。

2. 资本货物订单在 12 月略有下降。

(1) 订单在 2022 年上半年呈上升趋势，但在下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保持不变。

(2) 资本设备价格在 2022 年下半年持续快速上涨。

图 8 设备投资支出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

（二）第四季度非住宅建筑支出保持不变。

1. 实际非住宅建筑投资支出在第四季度以 0.4%的年率小幅增长。

(1) 建筑投资对 GDP 年化增长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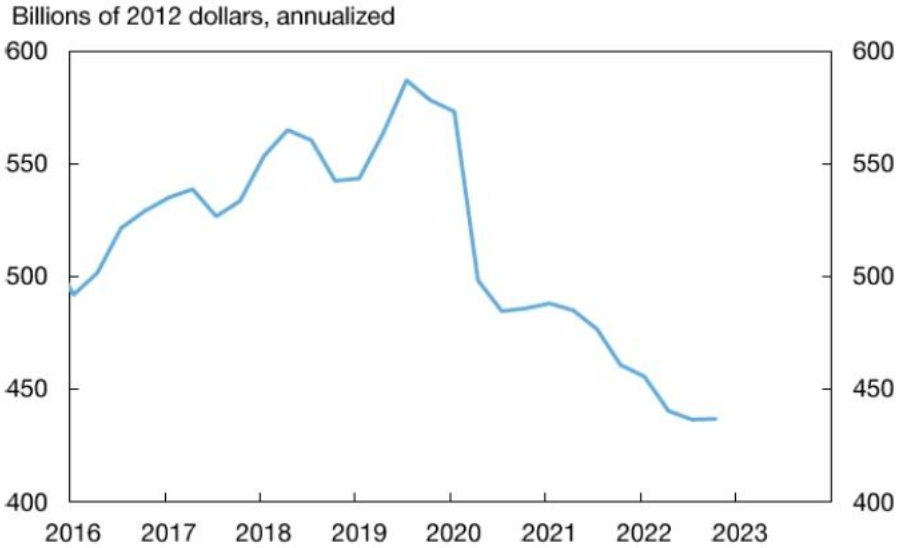
(2) 支出同比下降 5%，自 2019 年第四季度以来下降了近 24%。

2. 在第三季度下降后，能源领域的支出在第四季度有所上升。

(1) 与 2019 年第四季度相比，采矿勘探、竖井和油井方面的支出下降了 11%。

(2) 第四季度，制造业的建筑支出迅速增长。

图 9 非住宅建筑投资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

五. 房地产行业

（一）第四季度住宅投资支出下降。

1. 住宅投资支出大幅下降，使得第四季度 GDP 的年化增长率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

(1) 该季度的支出环比下降 27%（年率），并且同比下降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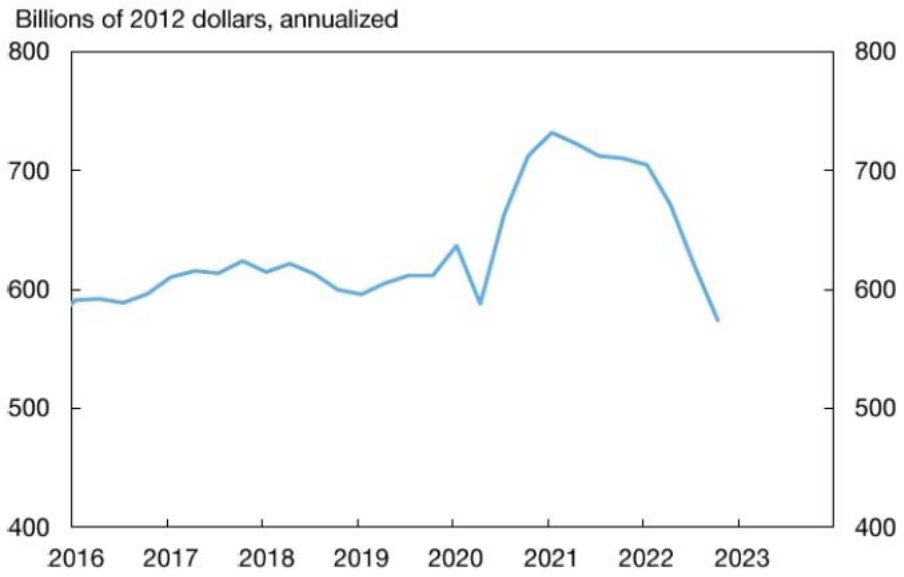
2. 独户住宅的投资环比下降 39%（年率），而多户住宅的投资环比上升 27%。

(1) 独户住宅的投资同比下降 23%，而多户住宅的投资与去年同期持平。

(2) 住房改善和佣金支出下降也是住宅投资下降的重要原因。

(3) 房屋开工量在 12 月份小幅下降。

图 10 住宅投资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

（二）现房销售下降至非常低的水平。

1. 第四季度的独户住宅现房销量较第三季度低了 42%（年率）。

(1) 第四季度的销量同比下降 32%。

(2) 12 月的销量同比下降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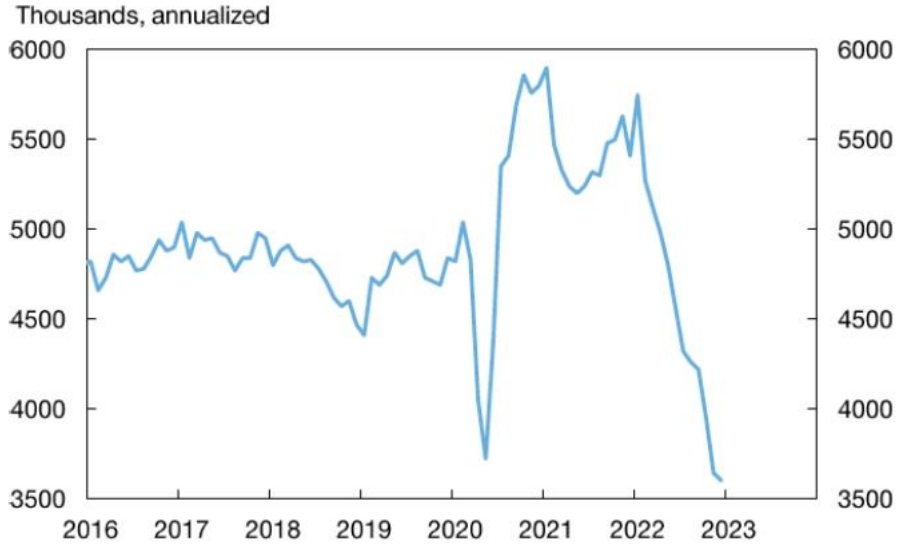
2. 第四季度的独户住宅新房销量反弹，较第三季度高出 19%。

(1) 第四季度的销量同比下降 20%。

(2) 12 月的销量同比下降 27%。

3. 与 6 月份的峰值相比，11 月份独户住宅的价格下降了 3%。

图 11 现有房屋的销售量



数据来源：人口普查局，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六. 政府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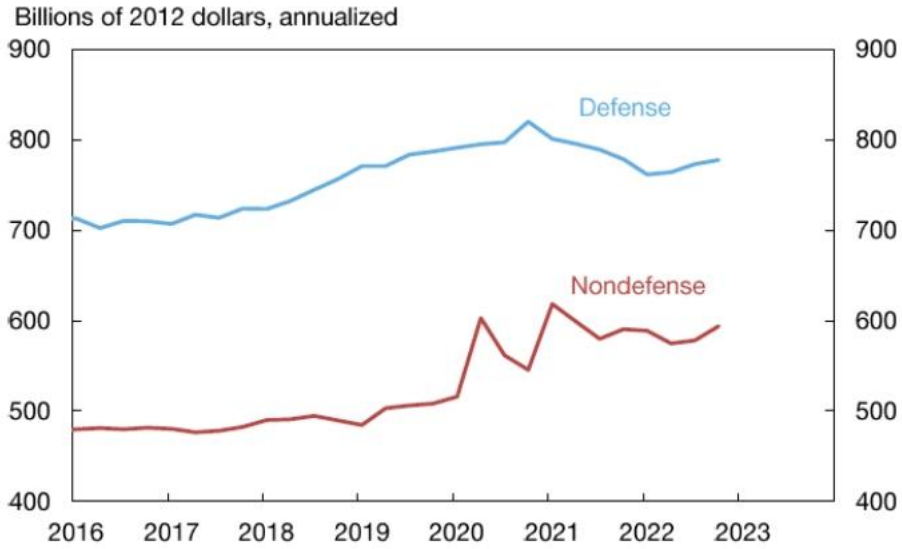
（一）第四季度联邦支出增加。

1. 联邦政府支出为第四季度 GDP 的年增长率贡献了 0.4 个百分点。

(1) 非国防支出和国防支出分别为经济增长贡献 0.3 和 0.1 个百分点。

2. 实际支出接近去年同期水平，其中国防支出和非国防支出都与去年同期持平。

图 12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

（二）第四季度州和地方政府支出增加。

1. 州和地方政府实际支出为第四季度的 GDP 年化增长率贡献了 0.3 个百分点。

(1) 支出同比增长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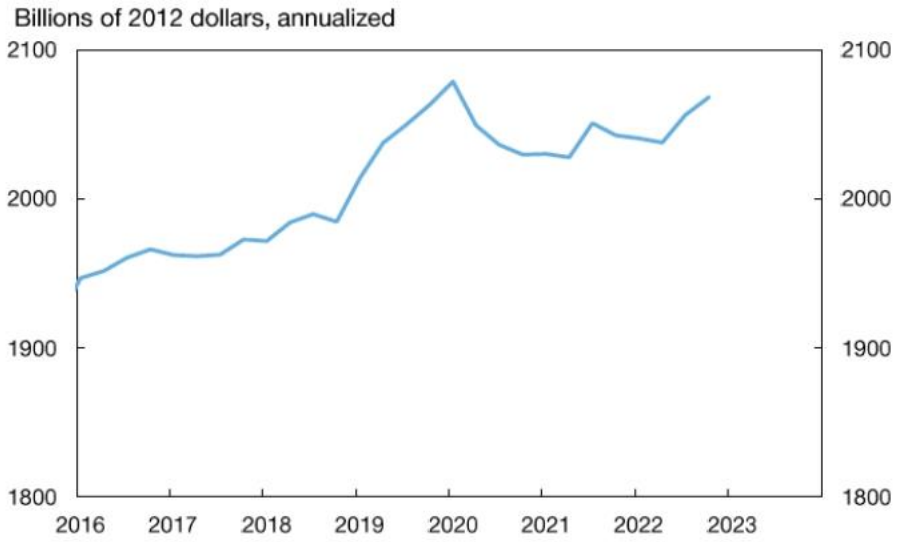
2. 州和地方政府的消费支出相比上季度增长了 2%。

(1) 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2%。

3. 投资支出环比增长 3%（年率），其中建筑支出增长 3%，设备采购增长 1%，知识产权产品支出增长 7%。

(1) 投资总支出与去年同期持平。

图 13 州和当地政府支出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

七. 通货膨胀

（一）核心 CPI 通胀放缓。

1. 核心通胀的同比增速从 11 月份的 6.0%降至 12 月份的 5.7%。

(1) 核心商品通胀从 3.7%降至 2.1%，其中二手汽车指数大幅下跌。

(2) 核心服务通胀从 6.8%升至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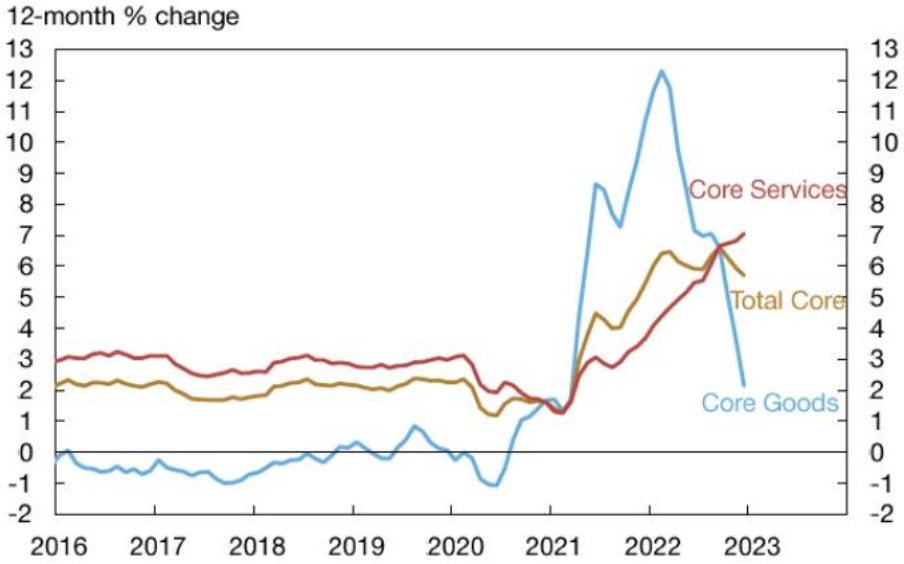
2. 核心 CPI 的环比增速为 3.7%（年率），高于 11 月份 2.4%的增速。

(1) 核心商品通胀从-6.1%升至-4.0%。

(2) 核心服务业通胀从 5.4%上升到 6.8%。

(3) 前三个月的核心 CPI 通胀从 4.3%下降到 3.1%，前六个月的通胀率从 5.4%下降到 4.5%。

图 14 核心 CPI 通胀率



数据来源：劳工统计局（BLS）。

（二）耐用品通胀下降。

1. 耐用品通胀的同比增速从 11 月的 2.4%降至 12 月的-0.1%。

(1) 价格的环比年化增长率为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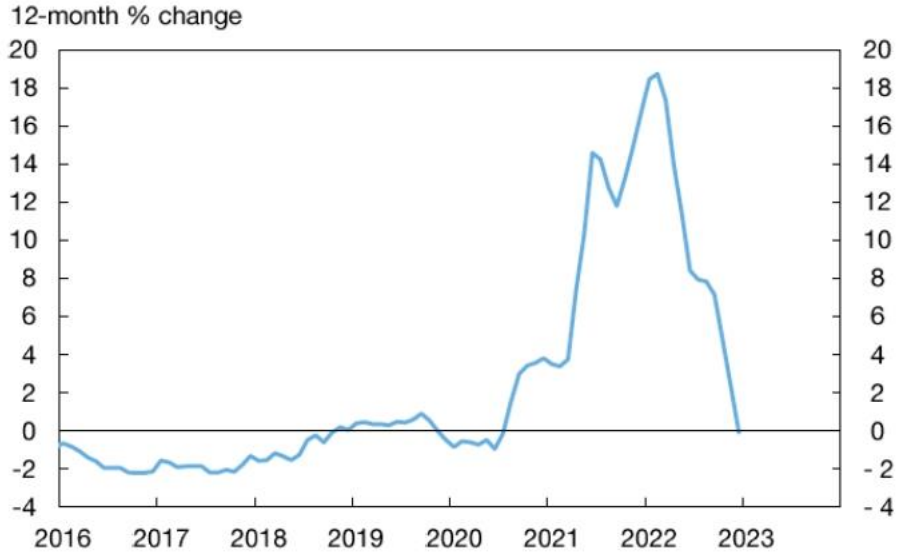
(2) 相比之下，在疫情暴发前的五年中，价格以 1%的速度下跌。

2. 新车价格同比上涨 6%，而二手车价格同比下降 9%。

(1) 新车价格较 2019 年平均水平上涨 20%，同时二手车价格上涨 35%。

3. 家居用品价格同比上涨 7%，娱乐商品价格上涨 4%，而 IT 商品价格下跌 12%。

图 15 CPI 通胀：耐用品



数据来源：劳工统计局（BLS）。

八. 劳动力市场

（一） 就业大幅增长。

1. 非农就业人数在 1 月增长了 51.7 万人，其中休闲和酒店业（+12.8 万人），专业和商业服务业（+8.2 万人）以及医疗保健业（+7.9 万人）的增幅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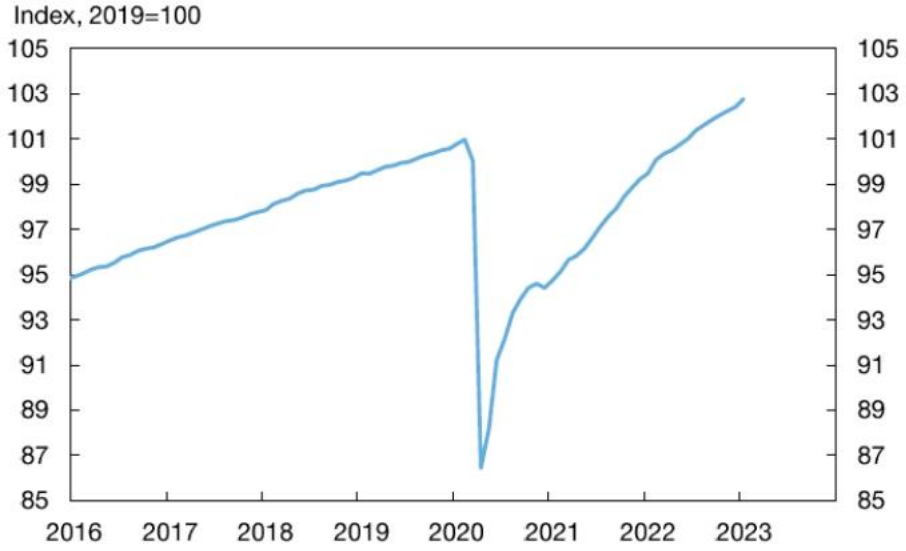
2. 家庭调查的就业人口比率由 60.1%上升至 60.2%。

(1) 自 3 月份以来，这一比率一直保持在 60%左右的狭窄区间内。

(2) 该比率比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低了 1 个百分点。

(3) 25-54 岁人群的就业人口比接近疫情前的平均水平。

图 16 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劳工统计局（BLS）。

（二）平均时薪增速放缓。

1. 与三个月前相比，平均时薪的增速从 12 月的 5.0%放缓至 1 月的 4.6%。

(1) 工资的同比增速从 4.8%下滑至 4.4%。

(2) 自 3 月份的 5.9%以来，工资的同比增速一直呈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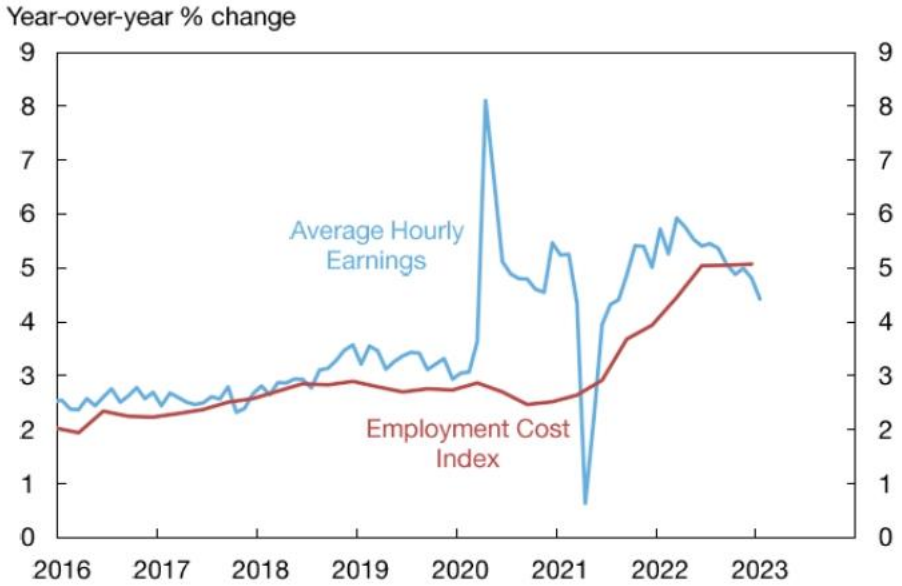
2. 从 9 月到 12 月，就业成本指数以 4.0%的年率增长。

(1) 这与 6 月至 9 月 5.1%的年率相比有所下降。

(2) 12 月该指数同比上涨 5.1%。

(3) 相比之下，该指数在 2019 年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速为 2.7%。

图 17 平均时薪和就业成本指数



数据来源：劳工统计局（BLS）。

九. 地区发展

（一）1 月份地区商业活动大幅下降。

1. 根据 1 月份的地区商业调查，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均出现下滑。

(1) 帝国州制造业调查的整体指数（制造业企业）下跌 22 个点至-32.9，为 2020 年中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情况之一。商业领袖调查的整体指数（服务业企业）下降 4 个点至-21.4，这是第四个连续出现的负值。

(2) 投入品价格上涨显著放缓，特别是在制造业。

(3) 两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都停滞不前。

(4) 企业普遍认为在未来六个月情况也不会改善。

图 18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帝国州制造业调查

数据来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二）纽约北部就业增长依然疲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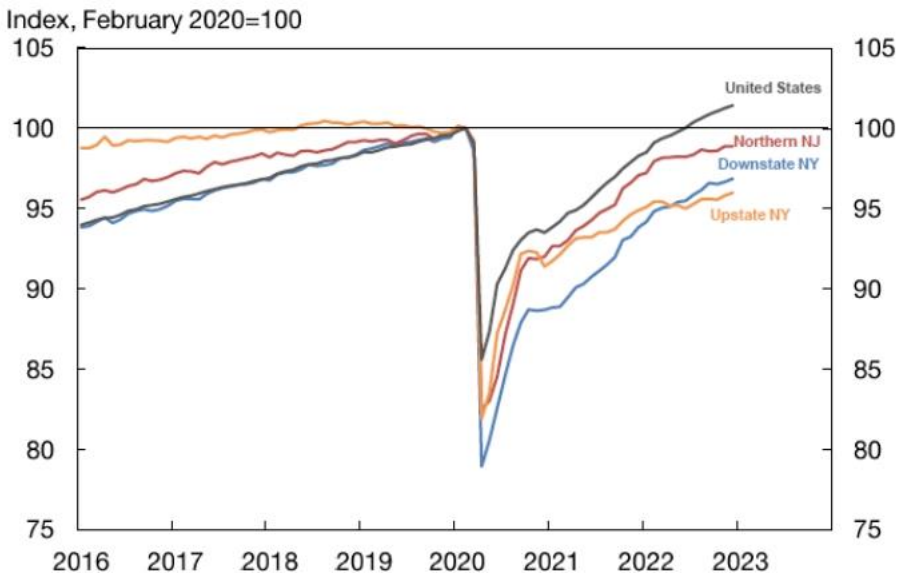
1. 12月份，纽约州南部和波多黎各的就业持续强劲增长，但纽约州北部的增长仍然相当缓慢。

(1) 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纽约州南部的就业增长了 3.2%，新泽西州北部增长了 1.9%，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增长了 2.3%，纽约州北部仅增长了 1.2%，而全国范围内的就业增长了 3.0%。

(2) 纽约州南部的就业率比疫情前水平低 3.1%，纽约州北部低 4.0%，新泽西州北部低 1.1%，费尔菲尔德低 0.7%，而全国则高出 0.8%。

(3) 波多黎各 21 月份的就业同比增长 3.7%，比疫情前水平高出 6.3%。

图 19 地区就业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和穆迪经济网，纽联储的工作人员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早期校准。

十. 国际进展

（一）净出口推动了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

1. 第四季度出口和进口均有所下降。

(1) 出口下降使得 GDP 年化增长率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而进口下降为 GDP 年化增长率贡献了 0.7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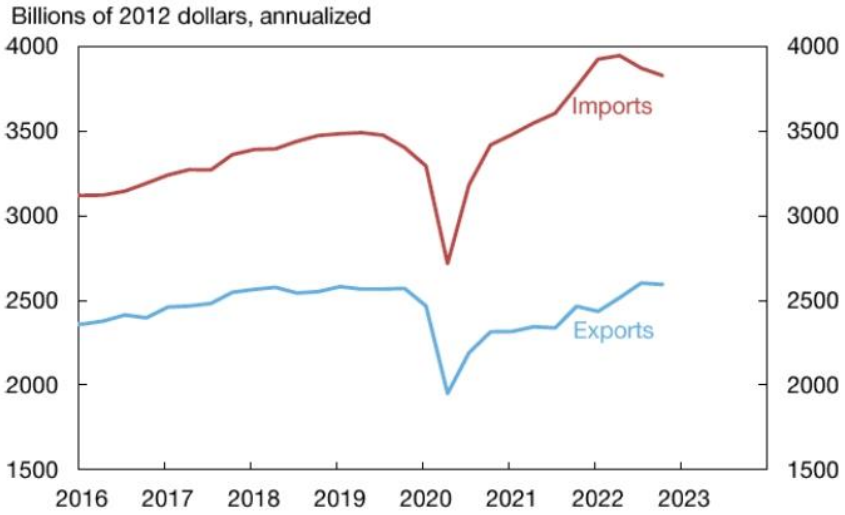
2. 在第二和第三季度大幅增长后，出口在第四季度出现回落。

(1) 食品、工业用品和消费品的出口下降被运输和旅行服务业的增加部分抵消。

3. 这是进口连续第二季度下降。

(1) 消费品再次大幅下降拉低了总进口量，而耐用工业用品和资本货物的降幅更小。

图 20 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



数据来源：经济分析局（BEA）。

（二）油价略微升高。

1. 油价（以 WTI 原油为基准）从 12 月份的每桶 76 美元升至 1 月份的每桶 78 美元。

(1) 2 月初油价保持在 75 美元/桶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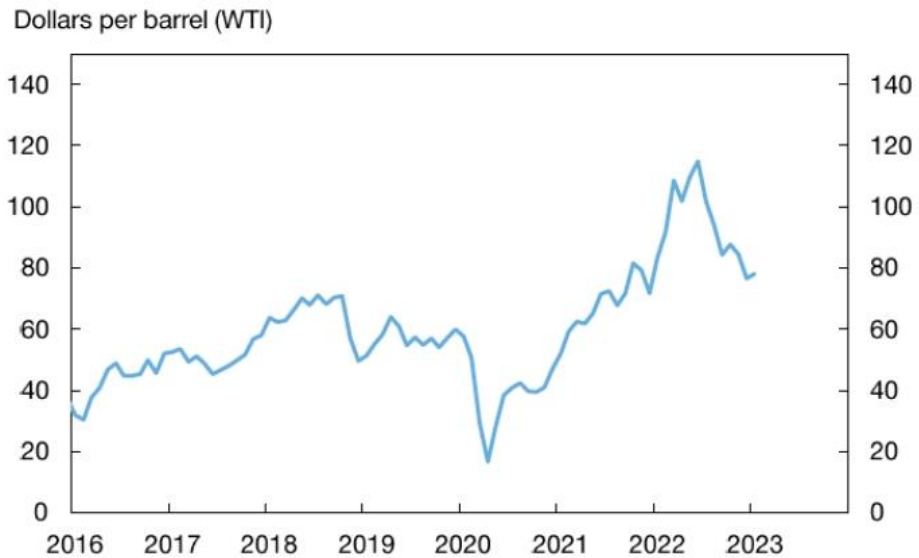
(2) 2021 年和 2022 年的平均油价分别为每桶 68 美元和 95 美元。

2. 美国能源部 2 月份的预测显示，2023 年石油全球库存的增长速度将接近 2022 年的增长速度。

(1) 预计 2023 年的消费和生产的增长都将很小。

(2) 预计今年的大部分产量增长将来自美国，而大部分消费增长将来自中国。

图 21 原油价格



数据来源：能源信息管理局。

十一. 金融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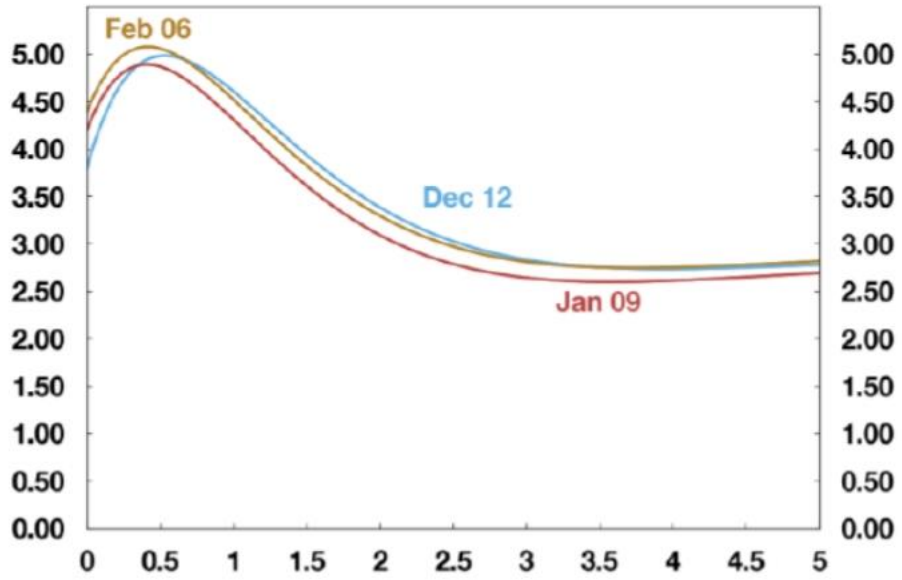
（一）联邦基金利率的隐含路径上升。

1. 2023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6 日期间，隔夜指数掉期（OIS）利率所隐含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期路径对于所有期限都小幅上升。大约六个月后，曲线将继续向下倾斜。

2. 到 2024 年底，市场隐含的联邦基金利率预计升至 3.4%，低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自 2022 年 12 月以来的经济预测摘要（SEP）4.1%的中值。

3. 在 5 年期限内，市场隐含的联邦基金利率升至 2.8%，高于 SEP 的长期联邦基金利率中值 2.5%。

图 22 预期联邦基金利率



数据来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计算；彭博财经有限公司。

注：估计使用 OIS 报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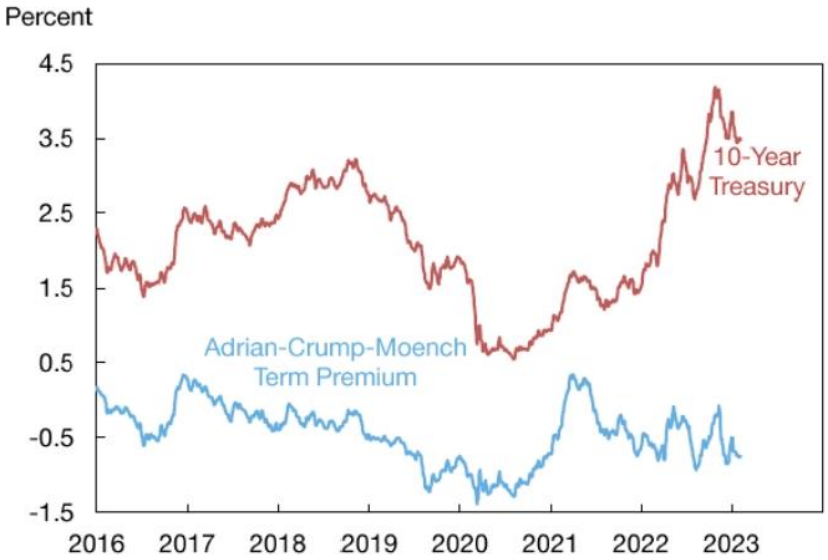
（二）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

1. 2023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6 日期间，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了 10 个基点。

(1)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的收益率均值分别为 0.89%、1.44%和 2.95%。

(2) 根据 Adrian-Crump-Moench 期限结构模型的估计，2023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6 日期间，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主要是因为预期利率路径上升更多抵消了期限溢价的下降。

图 23 10 年期美国国债和期限溢价



数据来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

注：5 天平均移动值。

（三）美国股价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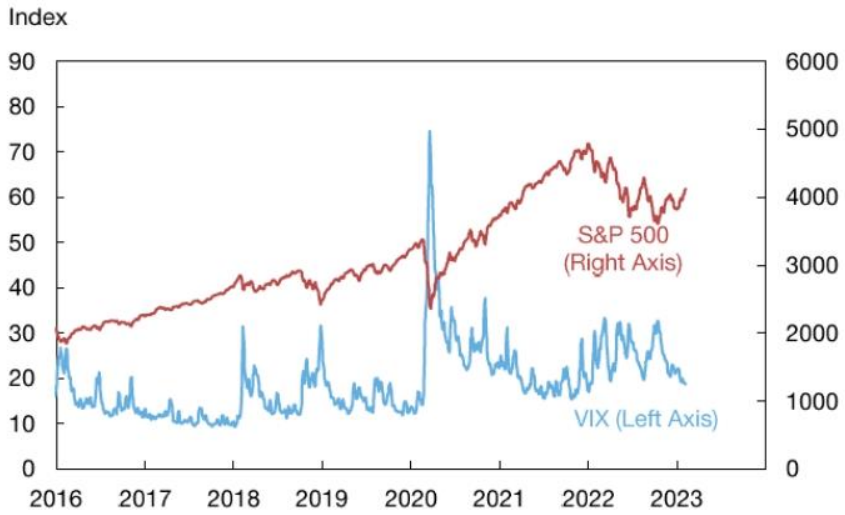
1. 2023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6 日期间，以标准普尔 500 指数衡量的美国股价上升了 6%。

(1) 标准普尔 500 指数在 2021 年上涨 28%后，在 2022 年期间下跌了 19%。

2. 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CBOE Volatility Index）衡量的期权隐含股市波动率从 1 月 9 日的 22.0 下降至 2 月 3 日的 19.4。

(1) 从 2000 年至今，VIX 指数的中值为 18.2。

图 24 美国股市指数和波动率



数据来源：S&P 和《华尔街日报》。

注：5 天移动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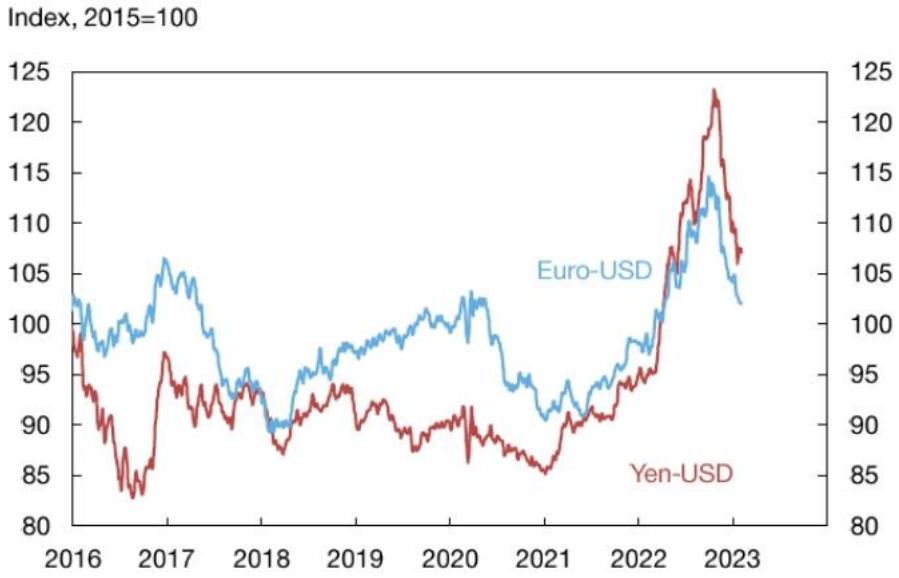
（四）美元贬值。

1. 2023年1月9日至2月6日期间，美联储的美元贸易加权指数下跌2%。

(1) 该指数在第四季度大幅下降，较2022年初的水平仍上涨了8%。

2. 2023年1月9日至2月6日期间，美元兑欧元下跌3%，兑日元下跌2%。

图 25 美元汇率



数据来源：联邦储备委员会。

注：5天平均移动值。

本文原题名为“U.S. Economy in a Snapshot”。纽约联储银行是组成美联储的12家地区联储银行之一，其设立目的亦是为了维护经济、金融体系的安全、公正和活力。《美国经济概况》汇编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和统计小组工作人员的观察结果。本文于2023年2月刊于newyorkfed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激进的环境政策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Anthony Venables /文 孔祥奕/编译

导读：向净零排放的过渡需要制定促进大规模碳排放转向无碳技术的政策。这种过渡往往涉及需求上的互补效应和同群效应。本文认为，在互补效应存在的情况下，需要实施变革性政策，推动社会走向绿色、低排放的平衡。政策可以包括限制高污染商品的销售、征税或逐步淘汰污染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政策来处理搭便车问题，并积极引导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其中。编译如下：

向净零排放的过渡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用于最终消费的商品、服务的技术。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车主就会选择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房主会选择从燃气转向热泵。钢铁厂会从煤炭转向能够利用太阳能或风能生产的绿色氢技术。铝生产商会从碳阳极技术转向惰性碳技术，大大减少冶炼过程中的碳排放。这些新技术都是革命性的，具有规模报酬效应，可以在“干中学”的过程中发展。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通过税收或可出售的许可证来为碳排放定价，而是制定政策鼓励从现有的碳密集型技术转向突破性的无碳技术。

需求端的同群效应

家庭和公司会作出是否进行技术转换的选择，但他们的选择不是孤立的。人们的选择通常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偏好由周围人的行为决定（Gillingham and Bollinger，2021；Talevi，2022；Boucher et al. 2022）。我们面临的机遇取决于其他人的投资和创新。在选择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时，我们受到邻居、充电桩数量、车辆的种类和质量的影响。这些因素会产生互补性的正反馈效应，一个人对电动汽车的选择会吸引其他人做出相同的选择。这一现象与传统教科书相反。在传统教科书中，个人的选择会提高所选商品的价格，会减少其他人的购买。

碳排放定价的不足

同群效应和其他互补性应如何影响气候政策的设计，特别是在低排放绿色商品或高排放棕色商品上收税或补贴？传统的政策建议是通过征收碳排放税或构建碳排放许可市场，通过内部解决碳排放造成的损害。税等于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即单位碳排放导致预期全球变暖损害的现值（Nordhaus，2008）。该政策建议忽略了一点，策略互补性是绿色转型的主导力量，人们习惯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受他人活动的影响。

由于普遍存在的正反馈效应，将碳排放价格设定为等于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不能成功实现绿色转型。相反，需要的是非边际的彻底变革，将经济、技术和社会从高排放转变为低排放。这种转变需要技术的改变。一旦改变，家庭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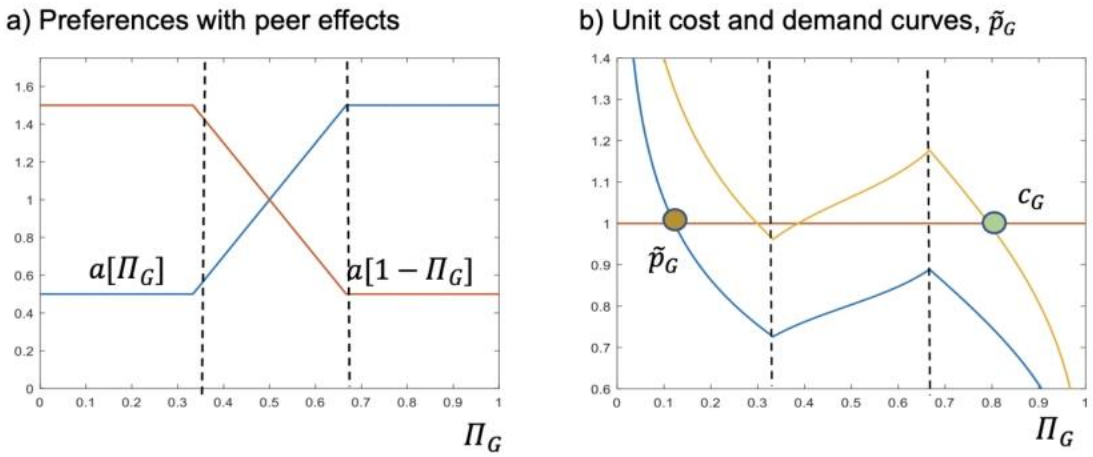
产者就会使用新的绿色技术。将碳排放价格设定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等边际政策只是在目前的污染状态下实现局部平衡。

技术转换需要激进的政策

本文通过微观模型证明了技术转换需要激进的政策。在同群效应模型中，人们可以选择低排放绿色商品或高排放棕色商品。本文的模型扩展了早期关于社会规范和改变平衡的工作（Nyborg，2020）。同群效应意味着选择电动汽车等绿色耐用品的人数增加了其他人做出同样选择的价值。机制如下图 1a 和 1b 所示，在文章中有详细说明。购买绿色耐用商品的人口比例显示在底轴上，该商品的价值如图 a 中的蓝线所示，其中向上倾斜的部分表现出积极的同伴效应，即价值随着购买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红线是购买燃油汽车等棕色耐用商品的价值，当棕色商品过时后其价值会发生损失。

将这些偏好放入替代偏好恒定弹性的消费者选择模型中，得出图 b 中的蓝色需求曲线，衡量绿色耐用商品的支付意愿。绿色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除非同群效应足够强，人们愿意为绿色产品付出更多，购买的人就越多。图 b 中的红线是供给曲线，为简单起见，假设绿色商品的供应价格是固定的，均衡状态下购买绿色商品的人口比例位于这些曲线的交叉点。我们称这一点为棕色平衡。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购买绿色耐用品，同群效应没有发挥作用。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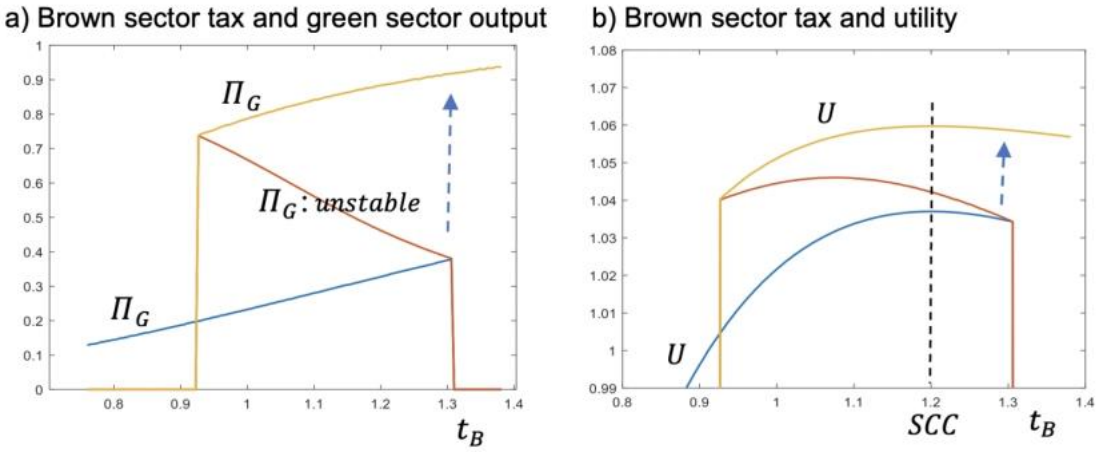
注：偏好中的同群效应会导致需求曲线向上倾斜，从而产生多重均衡的可能性。

政策可以补贴绿色商品，降低购买成本，或者对棕色商品征税，将支出转换为绿色，并将绿色商品需求曲线提高到图 1b 中的黄色曲线。随着需求曲线向上移动，有三个交点，从而有三个潜在的均衡。棕色平衡向右移动，存在绿色均衡，购买绿色耐用商品的人口比例更高。实现从棕色平衡转向绿色平衡的过渡需要政策搭配。带动消费绿色耐用品，可以通过数量措施来实现。例如限制棕色耐用品的销售，或者对棕色耐用品征收高额税收，将均衡提高到略高于图

1b 所示的水平。更激进的方法是规定禁止出售棕色技术和逐步淘汰棕色产品的日期。

图 2a 和 2b 显示了改变棕色耐用商品税率的影响，图 2a 和图 2b 的横轴为税率。因为税收不同，图 2a 追溯了绿色商品的情况。棕色商品平衡为蓝色；绿色商品平衡为黄色。对棕色商品征收一系列税，这两种均衡都是可能的。垂直箭头说明了临界点——当购买绿色商品的意愿超过其价格时，棕色平衡被破坏。然后，从棕色耐用品转向绿色耐用品的人群突然出现了一个大跳跃，从蓝线末端向上跳到黄线。如图 2b 所示，效用和福利也在这一点跃升。一旦转换到新的平衡，对棕色商品征税的政策就可以放松。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转型需要暂时的巨大推动，才能从高排放转变为低排放平衡。

图 2



注：效用最大化需要足够高的税收，才能从高排放均衡（蓝线）转向低排放平衡（黄色）。在上图中，税率超过了庇古税率。

对棕色商品征税与相当于碳排放社会成本的排放税有何关系？图 2b 使用该模型推导出每个均衡中的消费者效用，包括棕色商品产生排放的效用损失。根据通常的政策建议，碳排放的社会成本点使棕色产品和绿色产品均衡的效用最大化。但政策应该只寻求实现绿色均衡，才会产生更高的效用。简而言之，将碳排放税设定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不足以确保经济绿色转型达到更高的效用水平。因此，气候经济学中对增量碳定价的关注应该转移到实现所需技术转变所需的大推动政策上。

网络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需要激进的环保政策

上图举例概述了转型政策对成功实现绿色转型的必要性。在这个例子中，偏好是由同伴的行动决定的。这个观点适应更广泛的情况，包括网络效应的存在，绿色商品受到规模报酬和“干中学”的影响，或者现有的棕色产品技术由于供应商和技能系统的优势而僵化。在这些情况下，不同企业、家庭和政府机

构之间的互补性可以产生非边际性转型。过去的研究已经认识到，在进行定向技术变革的经济体中，路径依赖的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的需求（Acemoglu et al. 2012；Aghion et al. 2016、2021）。

分析框架可以加以扩展，以明确地处理过渡的问题。在这方面，期望起着关键作用。乐观预期和悲观预期都可以是均衡结果，前者导致绿色商品均衡的结果，后者导致棕色商品均衡的结果。税收或补贴政策可以起到消除悲观结果的作用，对未来绿色政策的前瞻性指导也可以直接作用于预期。

政策影响

上面的情况发生在全球变暖的外部性和互补性等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理想情况下，可以使用单独的工具来解决问题。但确定达到临界点所需的确切政策在实际中是很困难的。本文的观点是，无论使用何种手段，为了做出非边际的变革，实现向绿色商品和技术的过渡，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要以超出边际变化的方式思考。这可能需要寻找恰当的干预点，以利用需求和网络中的同群效应，并让绿色技术在生产中发挥作用（Abson et al. 2017；Farmer et al. 2019；Chapin III et al. 2022）。为了实现转变，政策制定者必须保证政策的延续性（Besley and Persson，2019、2020、2021）。因此，投资能够约束继任者政策的绿色技术是有帮助的（Harstad，2020）。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协调问题来指导经济，实现低排放均衡（Bretschger and Schaefer，2017；van den Meijden and Smulders，2017；Smulder and Zhou，2020）。

在全球经济中寻求统一的碳定价不太可能成功，因为在遏制排放方面面临着搭便车问题（Barrett，2023）。自上而下的政策架构必须被自下而上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倡议所取代（Snower，2022）。因此，直接推动从碳密集型技术转向无碳技术，更有可能实现净零经济的理想结果。与非破坏性环境技术相比，破坏性环境技术的创新者获得银行信贷的可能性更小（Roukny et al. 2022），因此需要制定政策来引导所需的资金从高排放平衡转向低排放平衡。为了向无碳技术转变，必须筹集资金，预先支付气候缓解支出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这一任务（Kraemer et al. 2022）。

本文原题名为“Radical Climate Policies”。本文作者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系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Anthony Venables 系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23 年 2 月刊于 VoxEU。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不稳定的繁荣：全球化如何使世界经济更不稳定

Enrique G. Mendoza 和 Vincenzo Quadrini /文 杨茜/编译

导读：本文发现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导致对全球金融资产的需求增加，其结构变化增加了对具有生产价值的资产需求，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激增。全球范围内对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提高了加杠杆的意愿。一方面，这导致金融部门扩大，对实际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它增加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和后果。编译如下：

摘要

过去三十年世界实际利率的急剧下降表明，全球对金融资产需求的激增超过了其供应的增长。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是由以下因素驱动的：（i）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ii）新兴和发达经济体金融结构的变化，以及（iii）发达经济体发行的公共债务的需求和供应变化。然后，本文发现低利率环境使世界经济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发现是基于两个地区的定量模型。在该模型中，私人发行的金融资产（即内部货币）提供生产性服务，但可能违约。

引言

图 1 所示的四个关键事实突出了过去三十年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

1．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发达经济体。如图 1 的第一个面板所示，1991 年至 2020 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 GDP 从 28%上升至 68%。相反，以购买力平价单位计算 GDP，这一比例从 57%增加到 125%。因此，无论是否根据实际汇率变动进行调整，新兴经济体相对规模的增长都显而易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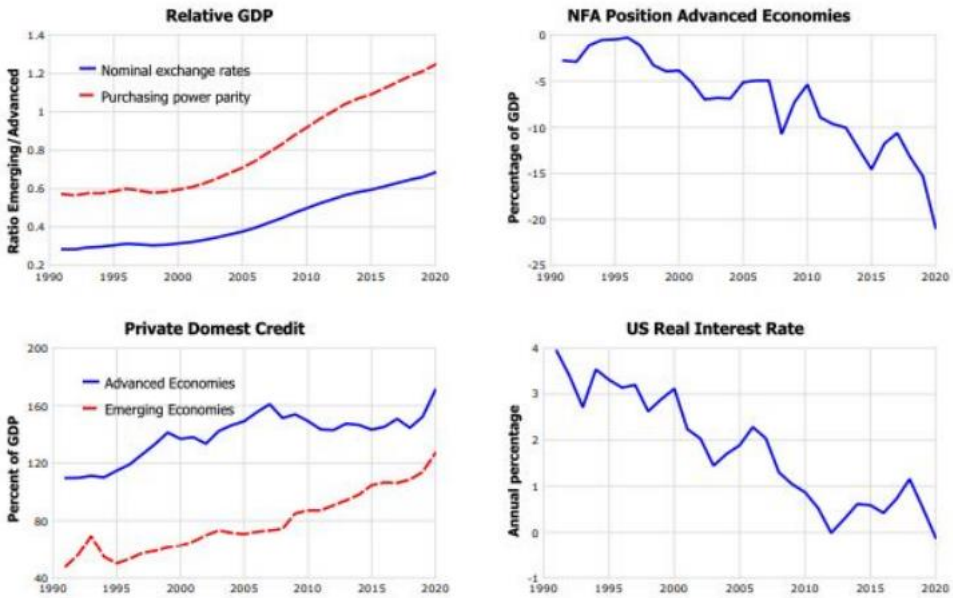
2．发达经济体的净外债大幅增长（这一事实通常被称为“全球失衡”）。如图 1 的第二个面板所示，发达经济体的净外国资产占其总 GDP 的比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接近零降至 2020 年的-20%左右。

3．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金融结构的巨大变化导致私营部门信贷大幅增长。图 1 的第三个面板显示，在过去 30 年中，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私人国内信贷占 GDP 的比例大约增加了两倍，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幅度仅约为 50%。新兴市场的国内信贷占 GDP 的比重仍低于发达经济体，但差距已显著缩小。全球金融中介的这种大规模扩张可能是由金融资产需求的增长和供应的增长（即发行债务）推动的。需求或供应增长更快对于确定均衡利率的反应方向很重要，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关键事实。

4．实际利率大幅下降。图 1 中的第四个面板描绘了美国长期公共债务的事后实际利率，这是无风险世界利率的代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4%左右开始，

实际利率呈下降趋势，到 2020 年底接近于零。基于通胀指数国债定价中嵌入的通胀预期的预期实际利率指标也显著下降。10 年期美国 TIPS 的市场收益率从 2003 年 1 月的 2.29%下降到 2020 年底的-1% 。实际利率的大幅下降表明，全球金融资产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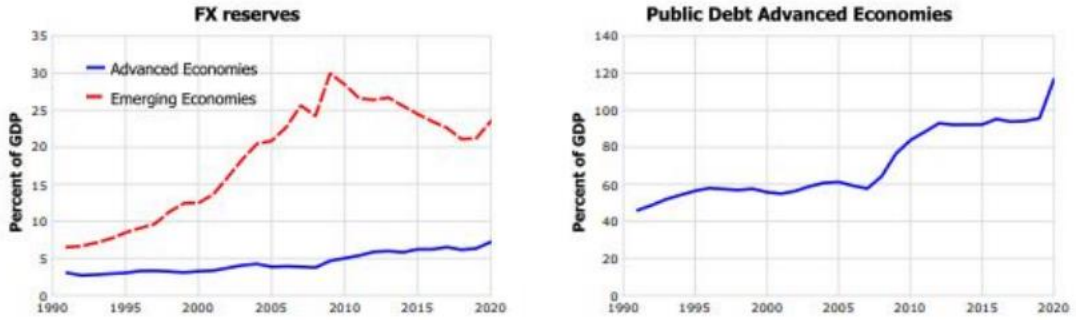
图 1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实际和金融趋势



注：新兴经济体：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智利、中国、香港、哥伦比亚、爱沙尼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南非、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委内瑞拉。先进经济体：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和国家外部财富数据库（Lane 和 Milesi Ferretti（2018））。

过去三十年有两个影响金融市场的趋势。图 2 的第一个面板显示，新兴经济体持有的外汇储备（即对发达经济体发行的公共债务的需求，特别是美国国债）占 GDP 的百分比大幅增加。第二个面板显示，发达经济体增加了公共债务的发行，其占 GDP 的百分比也有所增加。这些变化很重要，因为外汇储备的较高积累增加了对金融资产的需求（推动利率下降），而更多发达经济体发行公共债务增加了供应（推动利率上升）。

图 2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和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



注：外汇储备数据来自国家外部财富数据库（Lane 和 MilesiFerretti（2018））。公共债务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我们使用的中央政府债务系列适用于 13 个国家：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图 1 和图 2 所示的趋势出现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危机激增的时期。对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度量表明，随着资本流动的障碍急剧减少（见 Chinn 和 Ito（2006）），许多国家的外部资产和负债总额增长（见 Lane 和 Milesi Ferretti（2007）），实证研究中记录了金融危机频率的增加（例如 Reinhart 和 Rogoff（2009））。这些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在 1940 年至 1973 年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在 1973 年至 1990 年间只有少数几次发生。从那时起，已经发生了 15 到 20 次危机。1940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期间，新兴经济体的危机也很少见，但 1990 年后危机数量急剧上升（见 Sufi 和 Taylor（2021）的调查）。

本文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是确定和衡量导致金融资产净需求上升（相对于供应增长）并导致世界实际利率下降的因素。第二是评估这些变化对全球金融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我们通过两个地区的定量模型来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一个代表新兴经济体，另一个代表发达经济体。每个地区都有借贷部门。金融资产具有类似于“内部货币”的特征。这些债券由私人代理人（债务人）发行，体现了持有人和债权人的“便利收益”。便利收益来自金融资产在生产中提供的服务。

当借款人发行的债务大于其实际资产的清算价值时，就会发生金融危机。这推迟了信贷复苏，因此导致财富从债权人到债务人重新分配。金融危机导致的财富再分配是造成真正宏观经济后果的核心机制。重要的是，这些后果的严重程度取决于金融部门结构的变化，在模型中，金融部门的结构是由外生的结构变化以及内生的一般均衡调整所驱动的。

我们考虑三种外生驱动力的变化：（i）生产率，（ii）影响私人对金融资产需求的结构参数，以及（iii）影响私人金融资产供应的结构参数。此外，为了衡量公共债务市场变化的重要性，我们考虑了（iv）外汇储备和（v）发达经济体发行的公共债务的外生变化。然后，我们将该模型与图 1 和图 2 中绘制的数据结合使用，以识别和测量 1991-2020 年期间的这些变化。最后，我们进行反事实模拟，评估观察到的趋势以及对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的贡献。

反事实模拟表明，生产率、金融结构和外汇储备的外生变化都加剧了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发行的公共债务的增加减少了波动。

这些结果背后的机制可以描述为：生产率、金融结构和外汇储备的变化提高了对金融资产的需求，导致利率下降。随后，较低的利率导致有效杠杆率（即债务与资本清算价值的比率）上升，这反过来增加了金融和宏观经济的波动性。相反，公共债务的增加提高了金融资产的供应，减缓了利率的下降。

观察到的利率下降和净外国资产的动态变化是识别金融结构变化的关键。如上所述，利率的下降表明全球金融资产需求的增长超过了其供应的增长。净外国资产的动态变化对于确定哪些国家金融资产的需求增长超过供应增长非常重要。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净负债在样本期内扩大的事实表明，这些国家对金融资产的净需求增长低于新兴市场经济体。

相关文献

我们的工作涉及三类重要的文献：关于全球失衡的文献、关于金融危机或急停（sudden stop）的文献，以及关于金融资产增长和企业现金持有的文献。

对全球失衡的研究提出了几种理论来解释新兴经济体净外国资产头寸的增长。第一种理论是基于新兴经济体为跨期平滑创造可行的储蓄工具的能力较低（Caballero， Farhi 和 Gourinchas （2008））。另一种理论是新兴经济体对资产的需求较高，原因是保险较低，或与执法较弱相关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Mendoza， Quadrini 和 Ríos-Rull （2009）），或因为不确定性较高（Carroll 和 Jeanne （2009）， An geletos 和 Panousi （2011）， Song， Storesletten 和 Zilibotti （2011）， Sandri （2014）， Bacchetta 和 Benhima （2015）， Fogli 和 Perri （2015））。第一种理论强调资产供应的跨国异质性，而第二种理论强调需求的异质性。在这两种情况下，新兴经济体都转向发达经济体购买储蓄工具。第三种研究侧重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差异，包括部门生产率差异，以及由于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新兴经济体目标净外国资产水平提高（例如 Cova，Pisani 和 Rebucci （2009））。这也可能是资产重估的结果。Atkeson、Heathcote 和 Perri（2022）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净外国资产头寸的大幅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人在美国持有的资产价格上涨造成的。

我们的模型结合了金融资产供需的异质性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然而，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解释发达经济体为何向新兴经济体借款，而是两个新的目标：第一个是“衡量”金融资产供求结构来源的变化。第二是探讨这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

急停文献中的各种研究考察了金融全球化、信贷繁荣和高杠杆在引起金融危机中的角色。例子包括 Calvo 和 Mendoza（1996），Caballero 和 Krishnamurthy（2001），Gertler，Gilchrist 和 Natalucci（2007），Edwards（2004），Mendoza 和 Quadrini（2010），Mendoza 和 Smith（2014），Fornaro（2018）。其中一些研究强调了由于自我实现的期望而导致均衡多样性而导致金融危机的机制，如 Aghion，Bacchetta 和 Banerjee（2001）以及 Perri 和 Quadrini（2018）。我们模型中的危机也源于信贷和杠杆快速增长的时期，它们是自我实现预期的结果。然而，我们模型中运作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依赖于债权人金融资产的内部货币与债务人缺乏偿还承诺之间的相互作用。金融危机具有真正的影响，因为它将财富从债权人重新分配给债务人。

公司财务文献中的一些研究记录并解释了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一个例子是关于非金融企业不断增长的现金持有量的文献（例如，Riddick 和 Whited（2009）、Busso、Fernández 和 Tamayo（2016）以及 Bebczuk 和 Cavallo（2016））。我们的模型具有类似的特征，即企业家在金融资产中持有积极头寸，这些资产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金融结构的变化而扩张。然而，我们的重点是宏观经济影响。对金融资产净需求的增加压低了利率，进而提高了增加杠杆的意愿。虽然较高的杠杆率允许持续的金融中介和经济活动水平，但它也使新兴和发达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危机的影响。

论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 2 节描述了模型和均衡特征。第 3 节将模型与图 1 中绘制的数据结合起来，构建生产率和直接影响金融资产供求的结构参数的实证序列。然后，我们进行反事实模拟，以分解生产率变化和金融结构变化对趋势的作用。第 4 节分析了结构性变化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不稳定的影响。第 5 节为结论。

结论

新兴经济体规模增加的一个含义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更大。新兴市场是小型开放经济体的集合体，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微不足道，这一观点不再正确。

新兴市场通过许多渠道影响世界其他地区。本文强调了其中一个渠道：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导致对全球化资本市场交易的金融资产的需求增加，其结构变化增加了对具有生产价值的资产需求，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激增。

特别是，我们发现，全球范围内对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提高了增加杠杆的意愿。一方面，这导致金融部门扩大，对实际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它增加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和后果。

从政策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权衡：扩大金融体系的好处与更严重危机的潜在代价。类似的机制也出现在具有资产价格泡沫和借贷约束的模型中，如 Miao 和 Wang（2011）。此外，该模型预测了重大溢出效应，新兴市场储备的激增可能是导致发达经济体波动性上升的因素，而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的急剧增加可能是降低新兴市场波动性的因素。

本文原题名为“Unstable Prosperity: How Globalization Made the World Economy More Volatile”。本文作者 Enrique G. Mendoza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教授，Vincenzo Quadrini 是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副教授。本文于 2023 年 1 月刊于 NBE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主权债务危机、财政整顿和货币联盟中活跃的中央银行家

Paolo Canofari,Giovanni Di Bartolomeo,Marcello Messori/原文 郭子怡/编译

导读：本文在将金融稳定视为一种公共产品的假设下，研究了不完全的货币联盟中外生冲击对主权债务的影响。文章中分析认为，承诺积极的货币政策将稳定成本从受冲击的外围成员国分摊给核心国家，增强了财政纪律，从而维护整体金融稳定性，保护了各个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这一机制比严格的通胀目标机制和不干预政策更加有效。编译如下：

一．摘要

本文考察了不完全货币联盟中外生冲击对主权债务的影响。我们假设金融稳定性是一种公共产品，主权债务冲击可能会破坏相对脆弱的（外围）成员国的金融稳定。我们的模型表明，与通常的误解不同，积极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外围成员国政府放松财政约束；相反，这些政策倾向于通过降低稳定成本来巩固财政纪律。事实上，积极的货币政策将部分稳定成本从外围国家重新分配到欧盟的核心国家，维护了共同利益并加强了外围国家的财政纪律。

二．引言

2015 年夏季，希腊的大部分私人债务持有者选择“保释”，承担损失，以及希腊退出欧元区（EA）的可能性大幅增加，主权违约不再被视为极端事件。[1]这一戏剧性变化凸显了 EA 的制度设计过于僵化和脆弱，无法吸收外部冲击的影响。2007-2009 年的金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和 2020-2021 年的新冠疫情等事实证明，在 EA 这样一个不完整的经济和货币联盟中，存在着重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事件也表明了，即使金融危机只是发生在东亚小国，也会产生普遍影响，并在缺乏特殊举措的情况下普遍蔓延（Buti, 2020）。其本质含义是，EA 的财务稳定性应被视为一种公共利益。

本文主要关注欧洲央行（ECB）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反应。在金融动荡和随之而来的衰退期间，这种不稳定是由 EA 银行部门的流动性和破产危机，以及它们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所谓的“末日循环”），加上低利率环境下常规货币政策的局限性造成的。为了应对这些事件，欧洲央行使用了新的政策工具，如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和各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在这里，我们重点关注 Mario Draghi 用“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 it takes”）来形容并通过 2012 年批准的直接货币交易（OMT）手段来实施的新方法。OMT 的发布被认为是欧洲央行的第一个非常规货币政策举措，它以程式化的方式涵盖了后续

[1]事实上，2008 年波罗的海危机可以被视为 EA 崩溃风险增加的前兆。

非常规工具（如资产购买计划）的主要成分。一场场活跃的经济和政治辩论一直在评估这些政策举措的效果。[2]

我们旨在解决两个关键的政策问题：假设EA的稳定性是一种共同利益，而不对称的主权债务冲击可能会破坏这一利益。将最脆弱的（外围）国家的失衡作为一个私有问题来处理是否有效且高效？此外，在没有其他国家财政政策或中央财政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关于积极货币政策的承诺是否能有效地使外围成员国从不对称冲击中做出调整？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分析了在一个程式化的“核心-外围”结构的货币联盟中，在不同的中央银行政策选择下，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的原理和效果。我们坚定地认为，货币联盟的金融稳定性是整个地区的公共利益。在我们的模型中，这种稳定性可能会被特殊的主权债务冲击所破坏。具体而言，值得提及的是冲击（外围）国家并导致其政府债务过度偏离“自然”均衡阈值。这种偏差可能会破坏整个联盟的稳定。我们假设，由于缺乏财政和政治联盟（只有不完全的经济和货币联盟），合作均衡是不可行的。我们关注的是“非协作”的解决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会影响公共利益，却无法充分内化其所带来的外部性。

政策制定者的非协作型方案并非最优，其缺陷程度取决于货币制度。我们考虑了央行的三种程式化选择：1）不干预，2）严格的通胀目标，3）承诺积极的货币政策。简而言之，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共同央行”根本不会对外围国家的主权债务冲击做出反应。在严格的通胀目标下，央行严格遵循其使命，只采取措施以控制价格稳定。最后，在积极货币政策的承诺下，中央银行将根据主权债务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做出积极的反馈。我们将证明这种反应是相对最优的“不惜一切代价”的策略。

通过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共同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欧盟的金融稳定是一种公共利益，并可以通过将债务合并的成本从外围部分重新分配给核心国家来进行保护。我们的主要发现是，这种货币政策选择强化了国家层面的财政纪律。与严格的通胀目标制和不干预相比，积极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外围国家的债务控制，从而保持金融稳定。这些政策作为一种间接的风险分担机制，改善了欧盟的宏观金融稳定，并可能改善其福利。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 2 节进行了文献综述。第 3 节描述了我们分析的基础设定。第 4 节说明了我们的结果，并对货币制度的可行性和福利影响

[2]具体辩论内容回顾可参见 Benigno et al. (2022)。

提出了建议。第 5 节扩展了我们的模型，以考虑内生主权债务动态。最后，第 6 节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三．文献综述

本文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如前所述，在 Beetsma and Bovenberg（1998, 2001），Beetsma and Uhlig （1999），Dixit and Lambertini （2001, 2003b）等人之后，我们在财政和货币的合理标准战略互动模型中将金融稳定问题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引入。我们的研究和这些模型都在强调财政政策与共同中央银行行为之间联系，关注其战略性质。然而，以上被引用的作者并不关注主权债务冲击和金融稳定。参考 Bénassy Quéréet al.（2018）和 Buti（2020）等文献中的表述，[3]我们将金融稳定拓展为一种公共利益的概念，它可能会受到主权债务冲击的破坏。这些论文广泛讨论了货币联盟的制度和财政环境可能的演变方向，以及从欧洲危机中吸取教训后的适当政策组合。

我们的论文还与财政空间的相关文献有关。Ghosh et al. （2013）将财政空间定义（并估计）为当前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与该债务无法展期的内生限额之间的差额。债务限额源于“财政疲劳”（“fiscal fatigue”）的概念，即政府增加基本收入的能力无法跟上公共债务的增长。[4]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描述财政政策的短期约束。同时，我们假设财政当局履行其承诺，在长期内合理稳定各自的政府债务与 GDP 比率。我们采用（并简化）Ghosh et al. （2013）的方法来研究货币联盟下的情况。然而，我们并不关注国家财政政策成为机会主义行为工具的可能性。[5]在我们的框架中，冲击不是由国家财政政策当局不负责任的行为引起的。相反，这些国家当局竭力维持稳定，即使他们面临着财政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艰难权衡，也在尽力将政府债务保持在其“自然”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补充了解释战略违约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文献。[6]

最后，我们的论文寻求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分析解决货币联盟中关于风险分担的公开争论，尤其是 EA 中的相关问题。这场争论中明确提出了各种风险分担

[3]还可以参考 Beetsma and Giuliodori (2010) or Groll and Monacelli (2020)。

[4]参见 Bohn (1998 and 2007) and Mendoza and Ostry (2008)

[5]Benassy-Quéré et al. (2018)预测了“道德风险”在推动主权债务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各国的债务政策是出于防范“道德风险”；因此，在我们的框架中引用这一概念在理论分析和经验上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见 Tabellini, 2017）。补充最后一点，“道德风险”在分析上不同于机会主义行为的一般概念。

[6]参见 Aguiar and Gopinath (2006), Arellano (2008), Yue (2010), Chatterjee and Eyigungor (2012), Arellano and Ramanarayanan (2012), Mendoza and Yue (2012), Canofari et al. (2015), Canofari and Di Bartolomeo (2017), and Eijffinger et al. (2018)。

机制的利弊，表明每种机制的效果因其具体设计的微小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7]然而，最终，不同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前激励与事后激励的权重。在这方面，我们倾向于后者，因为我们不考虑长期的财政失职问题，而关注外部冲击的短期影响。

四．结论

每当联盟面临重大危机时，EA 都会谴责联盟的脆弱性和不完整性。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合理化解释欧洲央行在这些情况下的行为，其中我们假设货币政策可以采用不同的工具并在不同的设计下运作，与分散的国家财政当局进行战略互动。不同的架构会导致联盟国家在金融不稳定和风险分担方面产生不同的结果。

我们专注于主权债务冲击。我们设定了一个货币联盟的程式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们认为联盟的金融稳定是一种公共利益，外围国家的主权债务冲击可能会破坏它。通过研究货币和财政当局之间战略互动的逻辑，我们发现，当中央银行不对主权债务冲击做出反应（“不干预”）时，实现金融稳定的所有负担都由外围国家承担。结局就是，核心国家不执行任何相关政策；在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方面，它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但它仍被迫面临不受其控制的较高水平的金融不稳定性。这种情况下不存在风险分担。

相反，当中央银行根据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进行操作时，由于外围国家坚持更保守的财政立场，金融稳定性得到加强。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稳定成本由核心国家承担：核心国家经历了正通胀率（尽管平均通胀率为零），而外围国家则出现了不太严重的衰退。值得注意的是，零平均通胀目标意味着外围国家必须实施扩张性政策，否则这些国家将面临通缩风险。最后，当中央银行宣布以积极的货币政策对外围国家的财政整顿作出回应时，外围国家出现了正的通货膨胀率和更有力的财政纪律，因为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外围国家财政整顿的成本来加强风险分担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考虑分散的财政政策，但在一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战略下，会比在通胀目标制度下表现出更保守的政策立场。

我们还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积极的央行政策可能会纵容一些在财政方面不负责任的政府内生更多主权债务。然而，这种激励是相当有限的，只要假设中央银行只在特定情况下（即外债冲击）进行干预，就可以消除这种激励。外生债务和对财政不负责任的问题与其说取决于货币政策制度，不如说取决于制

[7]参见, Favero and Missale (2012), Issing (2009), Corsetti et al. (2011), Beetsma and Mavromatis (2014), Furceri and Zdzienicka (2015), and Giudice et al. (2019).

度设计。财政预算规则应该防止决策者不负责任的行为，否则不同的货币政策只会产生二级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欧洲央行在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实施的货币政策提供一个粗略的解释。然而，具体的实践需要引入额外的细节，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说明。因此，本文只是概述了一个建议性的解释。欧洲央行对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反应可以概括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2008 年 7 月和 2011 年夏季，也就是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全面卷入“厄运循环”之前的几周，欧洲央行采取的限制性货币政策可以被解读为：尽管发生了经济动荡，但仍试图将政策利率固定在不变的框架内。即“不干预”政策可近似理解为此时央行对国际和欧洲危机高峰的这种矛盾反应。

欧洲央行在 2011 年底和 2012 年初实施的政策（即 LTRO）代表了对厄运循环的第一反应。它成功地克服了欧洲银行业危机的高峰；然而，这不足以恢复东亚的宏观金融稳定。事实上，尽管向欧洲银行业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但 LTRO 无法重新激活银行渠道，并激励与风险分担举措相适应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我们的背景下，LTRO 的倡议可以大致等同于我们的通胀目标制度，该制度旨在实施部分和低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利率的事后调整代表了中央银行应对主权债务冲击的拙劣尝试。这种不足主要来源于这些事后调整与国家财政政策之间扭曲的相互作用。

最后，我们的积极货币政策机制基本涵盖了 OMT 宣布和实施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一些关键特征。众所周知，自 2012 年 9 月以来，东亚最脆弱的国家可以求助于 OMT，用以克服国际和欧洲危机遗留下的金融不稳定。而欧洲央行自 2014 年秋季以来采取的后续非常规举措（如资产购买计划），主张实施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有力支持了深度失衡中的政府维持平衡的短期可持续性。我们的积极货币政策表明，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向国家财政当局承诺货币扩张政策来应对主权债务冲击。这一承诺足以改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以及风险分担机制的最终效果。

根据上述叙述，我们的分析大致确定，欧洲央行采取的非常规举措确保了 EA 的金融稳定，而不会威胁其他不同类型成员国的长期经济平衡。特别是，OMT 公告所取得的结果与积极货币政策程式化模型的基本一致性也表明，即使在不完整的货币联盟中，在缺乏正式的事前协调的情况下，也有可能通过部分内部运作调整成本来促进风险分担。

本文原题名为“Sovereign Debt Crisis, Fiscal Consolidation, and Active Central Bankers in a Monetary Union”。本文作者 Paolo Canofari 于马尔凯理工大学经济系任教，Giovanni Di Bartolomeo 于意大利的罗马大学经济与法律学院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大学经济系任教，Marcello Messori 于意大利的 Luiss 大学经济金融系任教。本文于 2022 年 8 月发布。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经济制裁：演变、后果和挑战

T. Clifton Morgan, Constantinos Syropoulos, Yoto V. Yotov/文 王悦人/编译

导读：本文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了二战后经济制裁的演变，并反思了可以从其使用模式中吸取的教训。在这一时期，利用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情况显著增加。本文将这一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在此背景下讨论制裁的演变如何与同时代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突出特点相联系。本文对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关于制裁的文献的回顾表明，我们对制裁过程的理解可以通过结合这些文献中的观点而得到极大的提升。最后，本文确定了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和挑战，并讨论了如何利用跨学科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编译如下：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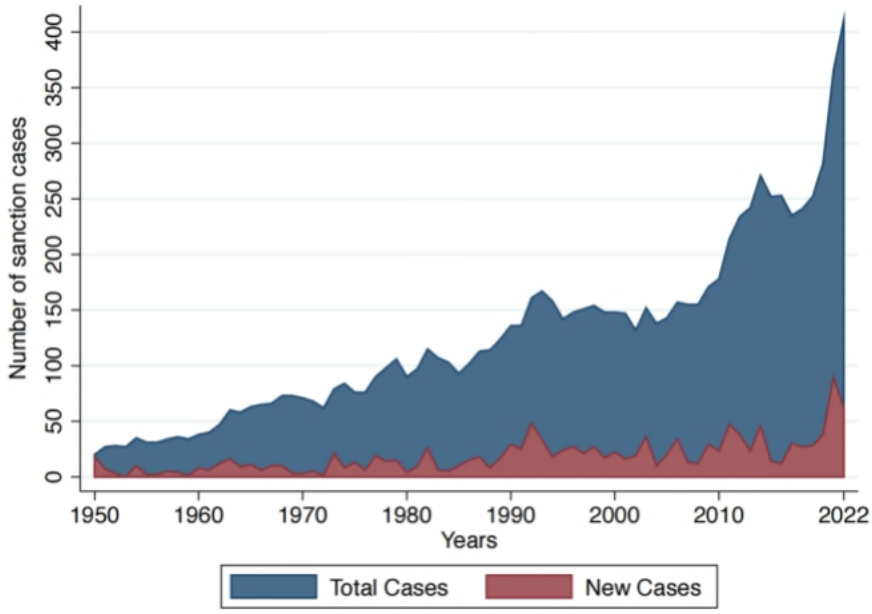
许多国家就 2022 年 2 月发生的俄乌冲突做出了回应，对俄罗斯实施了广泛的经济制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制裁也逐渐升级。这些制裁是有史以来对一个重要经济大国施加的最大范围的制裁之一，它引起了人们对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制裁以及制裁何时、如何发挥作用的极大兴趣。制裁，通常将其定义为“一个或多个国家采取的限制其与目标国关系的限制性政策措施，以说服该国改变其政策或解决可能违反国际规范和公约的行为”（Morgan et al.，2009；Syropoulos et al.，2022），其可以服务于多种目的，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制裁已被用于促进民主、推进人权事业、打击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破坏政权的稳定以及加速军事冲突的结束。制裁国通常会寻求限制与目标国家的贸易或外国援助，但它们也可以限制旅行、冻结资产，并使得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在相应的金融机构的权限失效。

本文将重点讨论自 1950 年以来有关经济制裁的模式和经验教训。为了帮助我们分析，我们将依赖全球制裁数据库（Global Sanctions Data Base，简称 GSDB）第三次发布的数据、Syropoulos et al.（2022）的数据，涵盖了 1950-2022 年期间的 1325 起制裁事件。制裁事件的定义是指制裁国（“发出国”）对被制裁国（“目标”）实施的积极制裁，发出国和目标国通常是个别国家，但在一些特殊案例中，发出国包含了一系列国家，其中也包括国际组织（如欧盟或联合国）。

与制裁的显著特征和演变相一致，GSDB 从与类型、发出国以及目标有关的三个不同特点/维度来划分制裁事件，例如：贸易制裁、金融制裁、旅行限制、武器制裁、军事援助制裁以及不属于任何主要类别的“其他”制裁。此外，还有九个制裁目标，包括改变政策、破坏政权稳定、解决领土冲突、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战争、结束战争、恢复和促进人权、恢复和促进民主以及其他目标。最后，对于所有已终止/解除的制裁，GSDB 会分配一个与每个制裁目标相对应的成功分数，从“完全成功”到“部分成功”“和解”和“失败”不等。

正如我们在后文所讨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制裁的使用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但有一个趋势非常突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使用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情况显著增加。图 1 突出体现了过去 70 年里将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情况的稳步增加——现在每年实施的制裁的事件数量大约是 1950 年的 10 倍。此外，虽然只有少数国家开始实施制裁（“主要发出国”），但这些制裁往往会引发反制裁或其他形式的报复性反应，对国际体系中的几乎每个国家都产生了影响。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追溯有关制裁的一些历史应用模式，其中许多模式可以与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演变特征联系起来。

图 1 1950-2022 年制裁事件数量的演变



注：本图显示了 1950-2022 年期间现有和新的制裁事件（任何类型）数量的演变。覆盖范围在 2022 年中期之前停止。该图是作者用 GSDB 第三次发布的全部样本制作的。

随着制裁措施使用的迅速增长，对制裁运行机制的研究在近几十年来也逐渐扩大。本文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检验我们对制裁的使用及其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的一些认识。这项研究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经济学家往往根据制裁的经济影响来进行评估，而政治学家则经常根据制裁的最终目标是否实现来评估制裁。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以进一步提高对制裁的理解和认识。

从我们对制裁使用模式的不断变化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当代的制裁政策与前几十年所采取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近期对于制裁的使用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针对关键个人、公司或部门设计制裁措施的必要性（例如：“聪明”或“有针对性”的制裁，包括金融和旅行制裁），而不是将制裁作为一种旨在伤害整个目标国的钝性工具（例如：贸易制裁）。我们目前有关制裁的理论和经验上

的理解并没有跟上这些变化。最后，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结论中，我们阐述了由当代制裁政策引起的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解决。

经济制裁的演变（1950-2019 年）

尽管我们在本节的重点是自 1950 年以来经济制裁的使用模式以及我们可以从研究经济制裁的模式中吸取的教训，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关于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优点的争论已经存在了至少 2500 年。最早（甚至是第一个）有记录的经济制裁实例之一可以在墨伽拉法令（大约公元前 432 年）中找到，根据该法令，雅典禁止与墨伽拉进行贸易，并拒绝墨伽拉人进入雅典的港口。表面上，这一行动是针对墨伽拉人开垦雅典土地并杀害雅典传令官而采取的外交措施。墨伽拉法令被许多人认为是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触发点，甚至是一个主要原因。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制裁是一种让墨伽拉人付出代价却不必发动战争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未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伯里克利说服雅典人采用墨伽拉法令，正是因为他打算煽动战争（Kagan，1969；MacDonald，1983），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制裁将被视为成功地实现了一个不一定存在的目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使用经济制裁作为战争的替代方案产生了广泛的兴趣。然而，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两个制裁事件的结果也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国际联盟于 1935 年对意大利实施了制裁，以应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阿比西尼亚地区。但在当时，意大利被视为纳粹在德国扩张主义的制衡力量，这使得英国和法国等国不愿实施这种制裁。最终，这些制裁被认为是一个损害了联盟地位的巨大失败。在第二个例子中，美国对日本实施了严格的贸易制裁，以阻止日本在东亚的军事行动。相反，这些制裁促使日本决定在 1941 年袭击珍珠港，扩大战争规模（Boudreau，1997；Hosoya，1968；Russett，1967）——这是另一个制裁未能取代军事冲突，并在制裁施行不久后出现军事冲突的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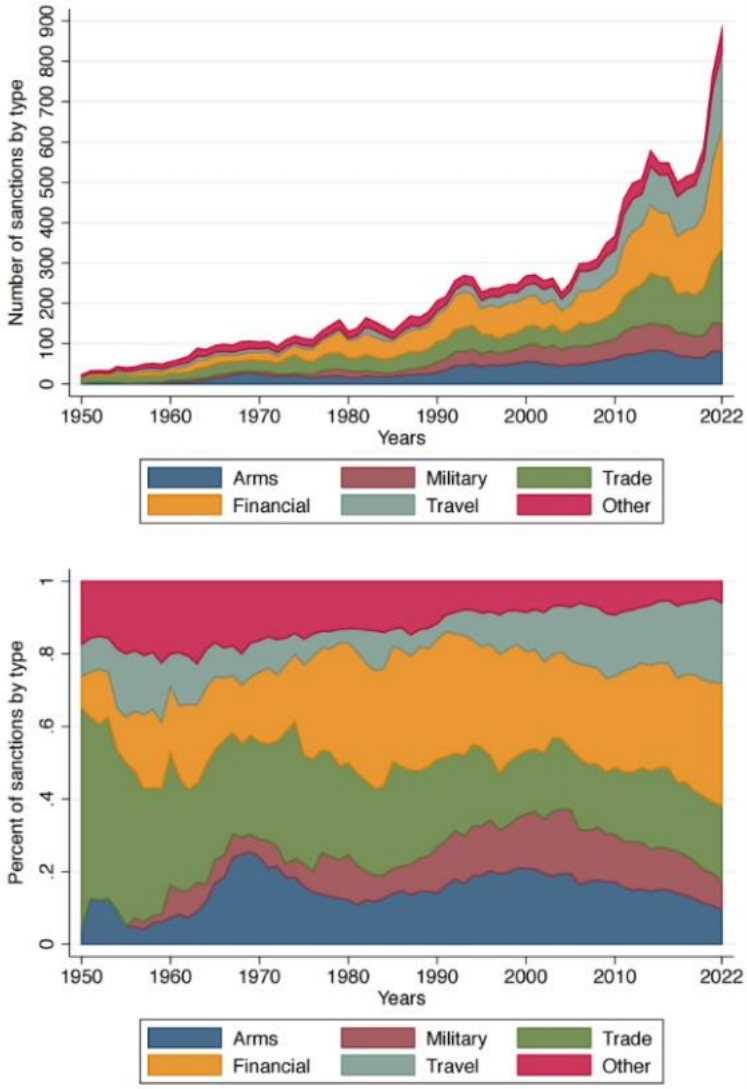
近几十年来，制裁事件数量的急剧增加是二战后开始稳步加速的结果。在实施制裁的目的、所使用的制裁类型以及实施制裁的国际行动者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我们概述了其中的一些变化，并将其与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划分确定了四个时代，但这种分类主要是为了方便，也并不能代表制裁的使用有确切的日期和急剧的变化。

冷战早期：1950-1975 年

在此期间，近三分之一的制裁是由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实施的。由于美国在联合国和特设多边联盟实施的许多制裁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迄今为止，美国是最多产的制裁者，故其对制裁使用数量的增加负有主要责任。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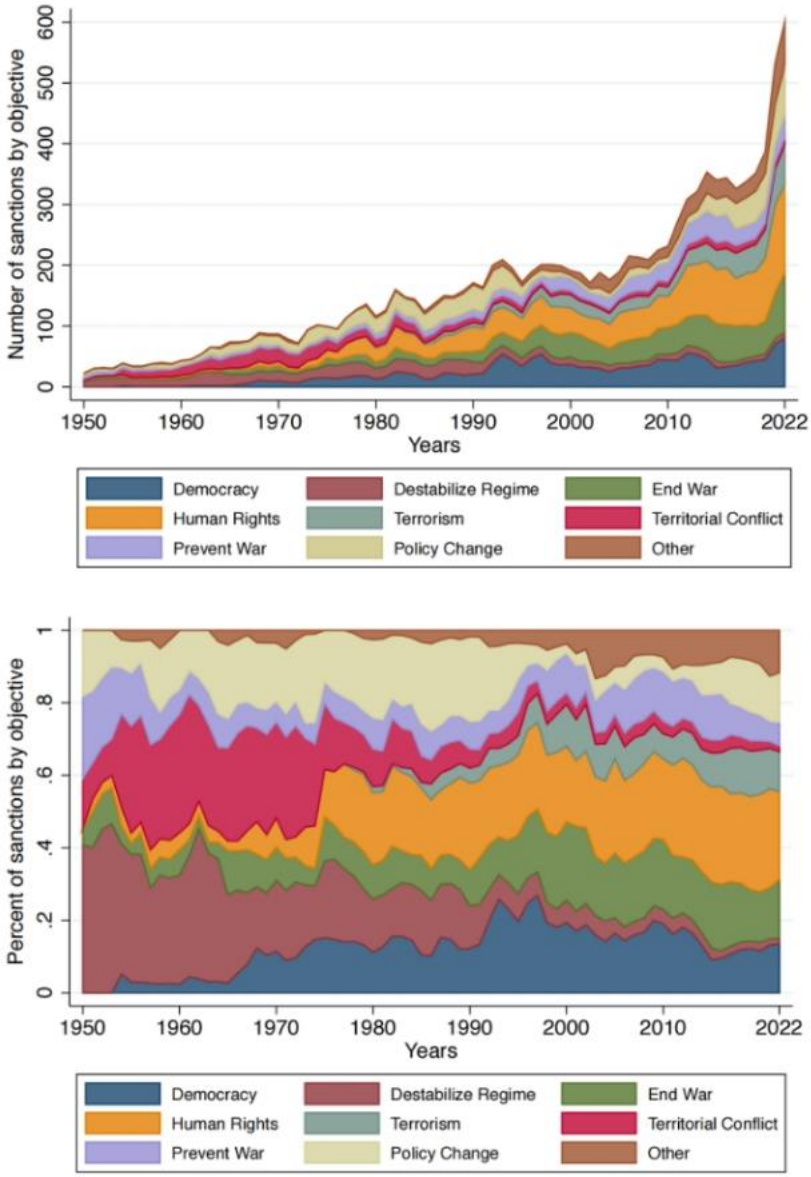
显示了已实施制裁的类型，图 3 显示了制裁的目的，它指导了我们对制裁演变的讨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大约 60%的制裁措施是贸易和武器禁运。这些制裁最常用于破坏政权的稳定或影响军事冲突的方向（通过向战斗人员施压，要求他们结束战斗，或支持发出国的领土主张）。

图 2 1950-2022 年按类型划分的制裁演变情况



注：该图显示了 1950-2022 年期间根据制裁类型的演变。覆盖范围在 2022 年中期之前停止。上方显示的是制裁数量的变化，而下方显示的是各种类型制裁的比例关系。该图的 Y 轴范围比图 1 中的范围要长，因为一些制裁案例包括了不止一种类型的制裁。该图是作者用 GSDB 第三次发布的全部样本制作的，同时请读者参考 Felbermayr et al.（2020）和 Syropoulos et al.（2022）的定义和其他划分制裁类型的例子。

图 3 1950-2022 年按目标划分的制裁演变情况



注：该图有助于直观地看到 1950-2022 年按目标划分的制裁演变情况，覆盖范围在 2022 年中期之前停止。上图描述了制裁数量在水平上的演变，而下图则显示了相同的百分比份额关系。该图 Y 轴上的范围与图 1 中的范围相比更长，因为一些制裁案例包括一个以上的目标。该图是作者用 GSDB 第三次发布的全部样本制作的，关于不同制裁目标的定义和例子，请读者参考 Felbermayr et al.（2020）和 Syropoulos et al.（2022）。

在此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加强了人们对发展军事力量替代方案的愿望。赫希曼的开创性著作《国家权力和国际贸易结构》（1945）为相信制裁可以提供这种替代方案提供了理论基础。赫希曼认为，贸易显著改善了所有人的经济福祉，但它也创造了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当各国通过商业相互依赖时，依赖程度较低的国家可能会利用限制性的贸易政策，通过在其他问

题的争端中获得影响力来增强其权力。许多高收入国家有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在二战中被摧毁，而美国经济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成为国际政治的决定性特征，美国经常使用制裁来支持其冷战政策（Barber，1979）。

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一时期的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所使用的一种工具，贸易制裁和武器制裁仍然是首选的“武器”，而且制裁经常被用于实现政权更迭，这并不奇怪。美国对古巴至今有效的制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与此同时，美国还经常对东欧的苏联集团国家实施制裁、拒绝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并经常制裁那些它认为“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家。

冷战后期： 1975-1990 年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西欧和日本已经基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并开始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Blum，2003；Mastanduno，2019）。当时被称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 EEC）的组织开始实现其承诺，即允许其成员以一个声音行事。尽管美国仍然是全球体系中最大的经济体，但一些经济“冲击”（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决定允许美元汇率浮动和 1974-1975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 OPEC）的石油禁运——导致油价的升高，巩固了苏联的实力，并可能增加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侵略性）突出美国日益增长的脆弱性。在政治上，美国因其长期而不成功的越南战争而被削弱。美国公众不太愿意使用军事力量，美国也已经失去了作为民主价值观和人权倡导者的一些地位（Eichenberg，2005；Jentleson and Britton，1998）。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强制性独裁和军事政府已经取代了早期的殖民政府和新生的民主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缓和时期，最明显的例外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该事件使得苏联遭到了重大的经济制裁。此外，一些游击队组织（如西德的巴德-梅因霍夫帮、意大利的红色旅和美国的共生解放军）开始使用恐怖主义战术。

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从图 2 和图 3 中制裁使用模式的变化中看出。使用制裁的速度继续加快，而美国仍然是最频繁的制裁发出国。值得注意的是，1977 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了美国总统在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监督管理各种经济事务的广泛权力。事实上，这项法律成为了美国制裁的“通用”法令，而美国经常使用经济制裁在当时是与国际习惯法相悖的（Hufbauer，1998）。然而，欧洲人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成为一个协同的制裁发出者。

在整个期间，贸易制裁被持续使用，但其在总制裁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金融和军事类制裁的使用已经开始稳步增加。虽然对破坏政权稳定的制裁继续以相当稳定的速度进行，但为保护人权而使用制裁的情况却开始急剧增加。

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制裁被广泛用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参见 Elliott and Hufbauer，1999；Hufbauer and Moll，2007；Choi and Luo，2013；Zanchetta，2016）。

冷战后：1990-2000 年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正处于一个“新世界秩序”的边缘，民主和自由的经济关系将蔓延，国家间的战争将（基本上）成为过去，国际组织将管理冲突和构建合作（Barnett，1997）。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戛然而止，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球大部分地区。1990 年 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国际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是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高了对多边主义的推崇，加强了多边主义的地位。美国采取了将中国完全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政策（Jacobson and Oksenberg，1990）。在经济方面，1992 年建立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欧洲走上了更大的经济协调道路。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 1947 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 GATT），使贸易关系更加规范，但也使实施贸易制裁变得更加困难（Charnovitz，2001；Mitchell，2017）。当然，事情的发展也从来不会这么简单。回过头来看，反对的种子也被埋下了。国际恐怖组织，特别是基地组织，开始集结力量。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全球化的反击和抗议。这些力量在 2000 年之后变得尤为突出。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采取制裁措施的频率一直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90 年代被称为“制裁十年”（Cortright and Lopez，2000），尽管它们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暗示。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贸易制裁的总体使用并没有扩大（甚至可能是收缩）。然而，金融制裁，特别是涉及武器转让的制裁的使用数量有所增加。就实施制裁的目标而言，在这一时期，使用制裁来实现政权更迭的情况大大减少，而使用制裁以促进民主和人权的情况大大增加。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制裁仍然是单方面实施的，但多边实施制裁的比例大幅增加，联合国和欧盟极大地扩大了制裁的适用范围。

911 后：2001 年至今

2001 年 9 月 11 日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引发了长达 20 年的反恐战争。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从民主化转向民族主义的过程。近期，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全球新冠疫情之后，世界也经历了重大的经济动荡。我们再次经历了欧洲的国家间战争，这引发了有史以来对一个相对强大的经济大国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制裁。

如图 1 所示，在 2001 年后的十几年里，制裁的使用增加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增长主要是以金融、旅行和其他针对特定个人和企业的制裁形式出现的。虽

然使用制裁促进人权的情况继续增加，但利用制裁促进民主的情况数量已趋于稳定。在这一时期，制裁很少被用来实现政权更迭，但用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制裁却大幅增加。

有几个因素有助于促进这些变化。首先，对定向制裁的日益依赖确实是在理论进步表明它们应该更有效之后发生的（Cortright and Lopez，2002；McGillivray and Stam，2004；Bapat et al.，2013；Peksen，2019）。其次，美国对其法律进行了一系列修改，使实施和执行金融制裁变得更加容易（Hufbauer and Moll，2007）。为了破坏恐怖组织的活动，美国现在要求金融机构跟踪和报告金融交易。这促使美国将制裁目标针对特定的公司和个人，并将这些制裁的大部分执行工作推给金融机构。美国还主张对以美元开展业务和/或通过美国金融机构进行支付方式的外国实体拥有治外法权（Hufbauer and Jung，2020）。此外，美国还实施了二次的域外制裁：即对与美国制裁名单上的实体做生意的企业，包括外国公司，进行制裁。第三，信息技术的非凡进步使处理每天发生的大量金融交易的信息成为可能。虽然我们有理论上的理由相信，制裁设计方面的这些变化应使其更加有效，并减少对无辜平民的伤害，但正如我们在下一节中讨论的那样，我们尚没有能力系统地评估这一承诺是否正在实现。

制裁对经济的影响和政治上的成功

几乎所有关于制裁的研究都集中在关于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的问题上。然而，经济学家倾向于用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害来解释“有效性”，而政治学家则认为制裁只有在实现他们宣布的政治目标时才“有效”。制裁的“有效性”“成功”和“影响”之间的分界线进一步模糊，因为有些制裁针对的目的可能是“假的”——即公开的政治要求只是为了掩盖另一个议程（Hufbauer and Jung，2020）。此外，当政治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时，很难确定制裁是否“成功”。在最近的一个例子中，最初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是为了劝阻其在 2022 年与乌克兰发生的冲突。但当制裁未能实现这一目的时，新的目的出现了：就这一冲突对俄罗斯进行惩罚；向乌克兰提供间接支持以进行反击，并诱导俄罗斯结束战争；削弱俄罗斯……使其无法再继续维持俄乌冲突的局面（国防部长 Lloyd Austin，《华盛顿邮报》，2022 年 4 月 25 日）。

为了尽量减少歧义，我们在术语上保持以下区别：（i）“经济影响”（或仅仅是“影响”）是指制裁的经济损失和成本；（ii）“政治成功”（或简称“成功”）是指制裁实现其宣布的政治目标的能力。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对制裁过程的理解表明，这些有效性的概念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两者都很重要：制裁的目的是对目标国施加经济成本，而这些目标国应该被说服从而改变其行为，以避免支付这些成本。然而，认为产生重大影响就能够代表成功，或者认

为缺乏成功意味着以前的影响很小，这似乎是不明智的。此外，我们对制裁过程的理解的进步要求我们解释这些学科差异之间的相互联系。

制裁的经济影响

广义上讲，经济学家认为，制裁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这些制裁效应可以通过其对目标国的影响而直接产生。但它们也可以通过针对主要制裁者的对等制裁，以及通过第三方国家间接产生。我们现在依次考虑这三个主要参与者。大多数关于制裁的实证文献的主要焦点一直是关于制裁如何影响目标国。为了量化这些影响，学者们使用了不同的数据集和各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相关文献中出现了四个一般性的结论。首先，制裁对各种经济主体的影响，例如个人和公司（Ahn and Ludema，2021；Miromanova，2021）、具体活动和部门（例如银行和金融（Arnold，2016）、农业（Larch et al.，2021）、旅游业（Hall and Seyfi，2021）和能源（Larch et al.，2022））一直是负面和显著的。

第二，经济制裁对被制裁国家的整体表现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包括贸易（Hufbauer et al.，2007；Kohl，2021；Felbermayr et al.，2022）、外国直接投资（Yang et al.，2004；Biglaiser and Lektzian，2011；Mirkina，2021）、增长（Neuenkirch and Neumeier，2015；Kwon et al.，2022a）、贫困（Neuenkirch and Neumeier，2016）、银行业和金融危机（Hatipoglu and Peksen，2018 年）以及政治稳定（Marinov，2005；Peksen，2021）。

第三，制裁对经济发展（van Bergeijk，1995）、贸易流动（Evenett，2002；Kohl，2021；Dai et al.，2022）、外国直接投资（Biglaiser and Lektzian，2011）、贸易的扩展边际（Crozet et al.，2021）和增长（Kwon et al.，2022 年、）的影响是持久的，甚至在制裁解除后仍然持续。

第四，制裁的影响可能非常不同，这取决于其类型（例如，贸易与金融制裁或完全与部分制裁），取决于它们是单边还是多边实施的（例如，联合国与美国的制裁），以及个别案例的具体情况。例如，参见 Felbermayr et al.（2020, 2022）and Dai et al.（2021）的贸易制裁分析，Ahn and Ludema（2021）的“聪明制裁”分析，Besedeš et al.（2017，2021）的金融制裁分析，Bapat and Morgan（2009），Neuenkirch and Neumeier（2015），Weber and Schneider（2021）对单边和多边制裁的评估，以及 Miromanova（2021），Felbermayr et al.（2020），和 Larch et al.（2021 年）对个别制裁事件的研究。因此，在前面提到的不同制裁维度上施加共同制裁效应的模型往往掩盖了非常显著的异质性的存在（Felbermayr et al.，2022）。

通常情况下，为了减轻制裁的不利影响，受制裁的国家会采取以下行动：将其国际贸易和投资流动第三国（Haidar，2017；Besedeš et al.，2021；

Felbermayr et al.，2022），保护某些经济主体（例如，Ahn and Ludema（2021）中被认为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大公司），与第三方友好国家结盟（Joshi and Mahmud，2021），以及像目前俄罗斯的情况一样，对他们的制裁者进行报复。根据官方文件，很难确定某些制裁是否是报复性的。然而，对 GSDB 的检查显示，这种制裁的数量非常少：它们通常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声明。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许多旨在估计制裁对目标国家影响的研究都面临着以下的内生性问题：促使制裁目标国家的事件——例如国内或国家间冲突和/或侵犯人权行为——也可能影响我们观察到的经济影响。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现存的文献都绕过了这个问题。Neuenkirch and Neumeier（2015，2016），Gutmann et al.（2020 年）和 Kwon et al.（2022a）是最近的例外。这些研究利用制裁的某些维度，已经解决了内生性的问题（例如，考虑与制裁国的法律和法规有关的、独立于被制裁国的事件的灵活工具变量）。未来对制裁影响的研究必须认识到内生性问题，并能够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用现有的方法还是用新的策略。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经济制裁对发出国影响的兴趣一直有限，也许是因为这种影响往往比较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制裁国家的经济规模比目标国家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这往往会削弱双边经济的依赖性。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对等反制裁威胁的发出国可能会将经济活动转向第三个未受制裁的国家。 此外。制裁者设计和/或实施制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或至少减轻制裁对其支持者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些国家决定不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而另一些国家则未能完全执行其已宣布的制裁。当然，发出国为尽量减少自身成本所做的努力会引起人们对其制裁政策的有效性、执行力和可信度的深刻质疑（Lektzian and Sprecher，2007；Bělín and Hanousek，2021）。

尽管发出国渴望并有能力将制裁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但最近的定量分析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由于发出国和目标国之间的经济活动显著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Besedeš et al.，2021；Crozet et al.，2021；Felbermayr et al.，2022）。尽管如此，由于以下几个因素，这些影响并不会对发出国产生重大影响，包括：受制裁国家和未受制裁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加强（例如，贸易转移）、主要发出国和目标国家之间的规模不成比例，以及制裁联盟中的一些发出国可能出现的退让。因此，与早期的文献（例如，Bayard et al.，1983；Hufbauer et al.，1997；Farmer，2002）相一致，最近的证据表明，制裁对发出国的影响往往是小而短暂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如果制裁对象是经济上的大国和强国，那么制裁给发出国带来的成本仍然会很小。

尽管制裁对发出国的影响有限，但我们看到了在这一领域未来工作的几个有希望的方向。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发出国能够选择制裁工具的最佳组合，并设计制裁，使目标国的经济损失最大化，同时使发出国自身的成本最小化，这应该是制裁理论模型的一个关键特征。从理论和经验上看，发出国可能会根据旨在掩盖其经济动机的政治声明来发布“假”制裁。因此，实施制裁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向发出国提供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已宣布的实施制裁的政治目标。这一说法也与实施制裁可能是为了满足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观点相一致（Kaempfer and Lowenberg，2007）。第三，制裁的成本可能会在发出国联盟的成员中被不成比例地分摊（felbermararet al.，2022）。这表明在制裁者联盟中采用可靠的再分配机制，以分担制裁的负担，对改善多边制裁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有一定的影响。

制裁除了影响发出国和目标国外，还可能影响第三国。尽管这些影响已经被决策者研究过，也被媒体广泛报道过，但它们在学术文献中引起的关注相对较少。相关研究已经确定制裁可能通过两个不同的渠道对第三国产生相反的影响：（i）“域外”渠道，这是通常对第三国产生不利影响的直接渠道；（ii）“一般均衡”渠道，这是一种间接渠道，制裁通过这一渠道（通常）对第三国产生积极影响。

制裁的一般均衡效应及其对第三国的影响背后的直觉是熟悉和容易理解的。受到制裁干扰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加强与第三国的（商业、金融和其他）关系，这些关系取代了失去的商业机会。例如，在 2022 年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后，印度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数量飙升。这些影响可以被量化——因为经济学文献已经开发了捕捉这种一般均衡效应的工具（Haidar，2017；Besedeš et al.，2021；Felbermayr et al.，2022）。

通常，制裁对个别第三国的一般均衡效应很小，因为被转移的活动分布在许多未受制裁的国家之间。然而，有些人怀疑，随着一般均衡影响在所有非制裁国家累积，对目标国的总体均衡影响可能很大，从而减轻了主要制裁效应所产生的预期制裁成本。这是“域外”制裁的主要动机之一，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将“域外”（或“次级”）制裁广义地定义为对来自非制裁国家的个人、公司、组织和其他实体的惩罚，因为这些实体与被制裁国家一起从事贸易、投资或其他商业活动。最近此类制裁的一个突出例子是美国对参与建设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的德国公司的威胁和行动。域外制裁及其影响已在大众媒体（彭博社，2021）、政策报告（欧洲议会，2020）、国际讨论（联合国大会，2011 年）和政治威胁（欧盟，2019）上有所涉及。还有大量证

据表明，这些影响对未受制裁的国家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Moehr，2019），而这些国家通常认为这些制裁是“被迫的”和/或“非法的”（Meyer，2009；欧盟委员会，2021）。

尽管媒体和政策分析人士注意到了制裁的域外影响，但相关的学术文献相对稀少。此外，现有的研究大多都是描述性的，并为域外制裁效应提供了有限的定性证据（Gordon，2016）。然而，最近的几项理论和定量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域外制裁对目标国家造成了巨大的额外经济损失，从而促进了制裁的政治成功（Han，2021；Kwon et al.，2022b）。然而，鉴于域外制裁对健全的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及其作为制裁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的作用（Early，2021），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量化其影响。

总的来说，经济学家得出结论，经济制裁可以对目标国产生重大的、可预测的、往往是长期的影响。鉴于我们对制裁进程的一般直觉，这可能使我们期望制裁成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然而，这并非政治学家们普遍得出的结论。

制裁的政治成功

长期以来，政治学家们一直在就制裁是否在实现其既定目标方面“有效”展开辩论。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突出的案例上，比如前文提及的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或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制裁，所得出的普遍结论是，制裁不会导致目标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Galtung，1967；Hoffmann，1967；Doxey，1972）。但人们很快就认识到，这项工作存在严重的选择偏差——研究中的案例之所以“突出”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们失败了。基于著名的 Hufbauer et al.（1990）数据集的早期的统计分析显示，制裁在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案件中实现了其政治目标。

然而，由政治学家进行的制裁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难题上：如果制裁很少“奏效”，为什么还要继续实施，而且实施速度越来越快？为解决这一难题，人们采取了几种广泛的方法。首先，一些人认为，虽然制裁在实现其既定目标方面似乎无效，但它们在实现其“真正”目标方面可能相对有效。一些研究者强调，这些目标之一可能是支持国内利益（Kaempfer and Lowenberg，2007）；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制裁是为象征性的（Lindsay，1986）或信号性的（Schwebach，2000）目标服务。

第二，一些理论论点表明，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否则不应期望制裁能够实现其目标（Morgan and Schwebach，1997）。例如，Wagner（1988）认为，如果我们将谈判理论应用于那些产生制裁破坏的经济交流的协议，我们将得出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制裁对发出国的伤害应等于对目标国的伤害。换句话说，制裁所提供的杠杆作用可以造成双向削减。Morgan et al.（2021）提供

的证据表明，制裁往往在威胁阶段起作用。因此，成功的制裁可能不会实际实施。

第三，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制裁也被证明在少数情况下是有效的。然而，即使是 25%的制裁成功率也比什么都不做高得多，而且制裁的成本可能大大低于其他替代方案，比如公开的军事干预。正因如此，也许我们更应关注实施制裁带来的收益而非不足。

最后，也许可以确定导致制裁对目标国造成的成本增加的具体因素，从而确定什么时候制裁是无效的，以及如何使制裁更有效。例如，Attia et al.（2021）表明，目标国的经济健康状况不佳和高政治波动是制裁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他人则发现，经济关系中断的程度是制裁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Bapat et al.，2013）。此外，制裁终结者或“黑骑士”的出现，可以使目标国避免大量的成本（Early，2011）。与此相关的是，多边制裁，尤其是在国际组织支持下实施的制裁，相对来说比单边制裁增加了目标国的成本（Martin，1992；Bapat and Morgan，2009；Early，2021）。最后，对民主国家实施的制裁比对专制国家实施制裁更可能有效，因为在民主国政府下，民众对制裁带来的生活成本方面影响的感受更容易传递给政府（Allen，2008；Lektzian and Souva，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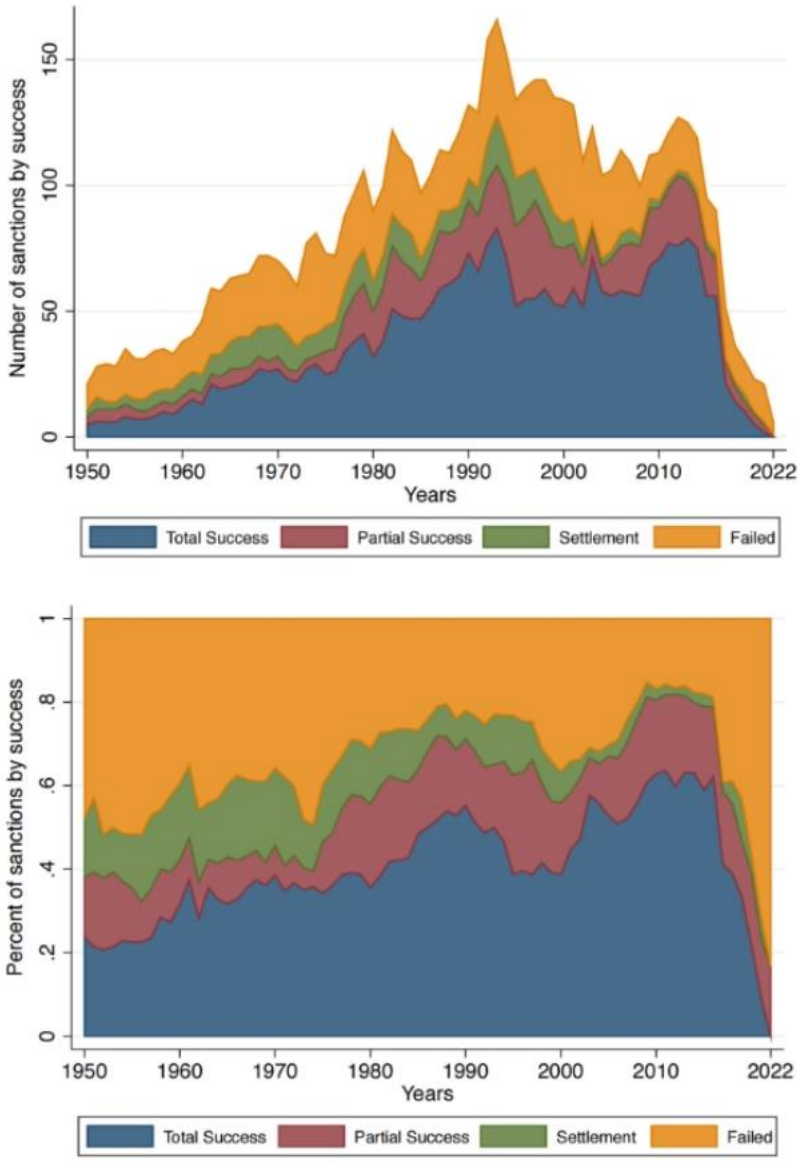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上述所有发现似乎都对模型规范相当敏感（Bapat et al.，2013）。事实上，考虑到替代模型和规格，证据的分量甚至可能会推翻现有的这些结论（Demena et al.，2021）。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制裁成功的研究面临着内生性问题，就像对制裁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一样。例如，发出国控制着制裁的设计，包括所实施的制裁（例如，贸易禁令、资产冻结和撤回外国援助），以及解除制裁所需要满足的问题或要求（例如，结束战争、改善人权）。鉴于这些选择是相互交织的，可能很难将制裁的影响与重大问题的棘手程度区分开来。一些研究表明，在这一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例如，Morgan（1995）利用几十年的跨国数据表明，如果伴随的要求得到了适当的调整，小规模制裁威胁可能比重大制裁威胁更有效。同样，Biersteker and van Bergeijk（2015）证实，具有狭义目标的制裁以及伴有其他政策工具的制裁的成功率更高。

基于 GSDB 的简单分析提供了更多的信息。GSDB 认识到制裁者通常有多个目标，并为每个制裁目标分配一个单独的成功分数（从“完全成功”到“部分成功”“和解”和“失败”不等）。这种分类是基于政府官方声明或国际新闻公告中的间接确认，表明制裁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图 4 的上半部分追踪了按成功率计算的制裁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而下半部分则将这些数字转换为百分比

项。由于一些制裁包括一个以上的目标，因此对每个目标的成功进行了界定。该图中出现了几种模式。

图 4 1950-2022 年按成功率计算的制裁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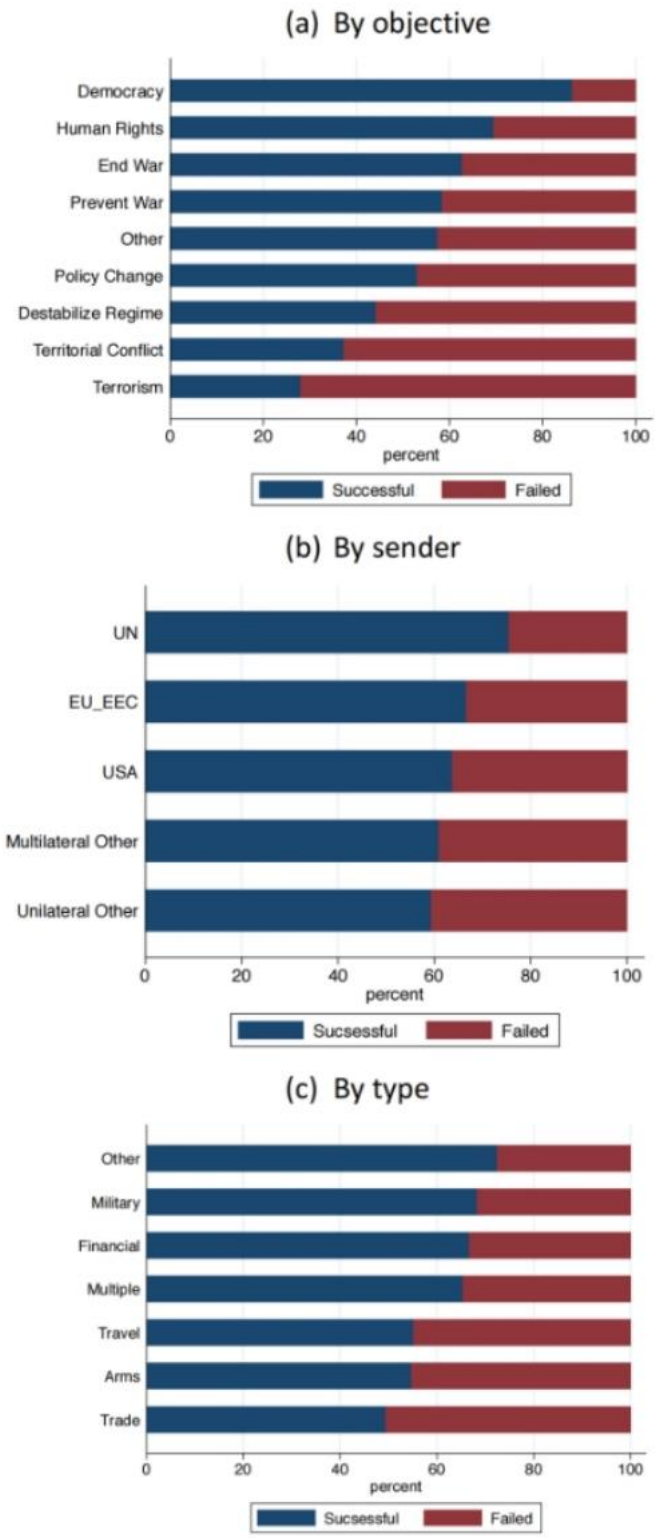
注：该图说明了 1950-2022 年根据实现其各自政治目标的成功程度的制裁演变情况，覆盖范围在 2022 年中期之前停止。由于一些制裁措施包括一个以上的目标，因此成功与否是针对每个目标的。正在进行的制裁不包括在构建这些图标的数据中。上图描述了制裁数量在水平上的变化，而下图则以百分比份额的形式呈现出相同的关系。该图是作者利用全球制裁数据库第三次发布的数据制作的。

首先，在图 4 的上半部分，我们看到目标被定义为“成功”的制裁数量稳步增加，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达到一个峰值。它在 2013 年左右达到了另一个峰值，此后一直在下降，这种数量下降在经济困难时期尤其明显（例如，2000

年代早期和后期的经济衰退，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时期）。第二，与早期认为制裁不起作用的文献观点一致（Galtung，1967；Pape，1997；Hufbauer et al.，2007），图中面板显示，“成功”制裁的比例相对较小——平均约为 42%。第三，尽管增长速度有些放缓（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成功制裁的比例仍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加，一直到 2016 年，这表明近年来制裁变得更加有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制裁在实施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学习效果，制裁的效力有所提高（Early，2021；Biersteker and Hudáková，2021）。最后，近年来，成功实现目标的制裁比例急剧下降，这与特朗普担任总统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时期相吻合。

图 5 描述了制裁在三个方面的成功情况——目标、发出国身份和类型，并得出了三个教训。简化对制裁成功的目标分析，我们将四个成功类别转化为二元成功指数，如果 GSDB 中相应的成功类别是“完全成功”或“部分成功”，则定义为“成功”；如果相应的成功类别是“和解”或“失败”，则定义为“失败”。图 5 的上半部分显示，最成功的制裁是那些旨在改善民主和人权的制裁，而最不成功的制裁是那些旨在实现政权更迭、解决领土争端和恐怖主义的制裁。“其他”这个类别，包括那些不够突出、不足以形成一个单独组别的目标，也是相对成功的类别之一。对其更进一步的解释即“其他”类的制裁往往是为了实现非常具体和切实的目标（例如，结束毒品贩运、释放被监禁的公民和打击腐败）。

图 5 制裁成功的决定因素



注：此图显示了制裁成功与各种制裁特征之间的关系。面板（a）根据制裁的目标描述制裁的成功与否，并依靠正文所述的二元成功得分计算标准。面板（b）和（c）分别描述了按发出国和根据制裁类型的制裁成功率。面板（b）和（c）中所使用的成功得分指数，详见正文。该图由作者利用 GSDB 的数据制作而成。

如前所述，GSDB 为每个制裁目标分配了一个独特的成功类别。然而，由于一些制裁包括多个目标，因此不可能根据制裁案例、发出国或制裁类型来分配唯一的成功类别。因此，为了按发出国和制裁类型分析制裁成功率，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综合成功评分指数。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将失败、和解、部分成功和完全成功等原始类别分别赋予从 1 到 4 的值。然后，对于每个发出国或制裁类型，我们取相应的成功分数的平均值。

为了获得图 5（b）组的结果，我们根据一个特定案件中是否涉及一个或多个发出国来区分多边制裁和单边制裁。此外，鉴于美国作为制裁者的突出地位，我们将美国的制裁与其他单边制裁、欧盟制裁、联合国制裁和其他多边制裁分开。组（b）得出了几个直观的结论。多边制裁比单边制裁更有可能成功，特别是在一个国际组织参与的情况下。此外，美国实施的制裁比其他单边制裁更为成功。

通过图 5 组（c）中所示的不同类别制裁的成功结果，我们看到聪明/有针对性的制裁（例如，金融和旅行制裁）比贸易制裁更有可能成功。从上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成功的类型变得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而不太成功的类型的数量则逐渐减少。这种转变可以解释制裁的总体成功率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并且与基于学习效应的解释相一致）。

总的来说，从本节分析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似乎并不完全一致。制裁似乎确实在不同方面对目标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尽管从直观上可以认为，目标国的经济损失和成本应该是影响制裁成功率的关键因素，但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经济代价和制裁的政治成功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此外，虽然最近的趋势表明制裁的有效性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制裁仍然未被视为特别成功的政策工具。

当然，我们可以对这些结论中的明显不一致提出一些可能的假设。例如，制裁可能确实会造成经济损失，但这种损失可能不足以导致政治上的成功。此外，委婉地说，制裁的执行通常是不严格的（Morgan and Bapat，2003；Bapat and Kwon，2015）。全面或二级制裁可能会给希望避免这些代价的国家造成重大成本；事实上，许多个别国家没有基础设施或能力来检测、调查或起诉旨在规避制裁的复杂经济活动。此外，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和改善执法的努力可能会受到那些受到不利影响的行动者的阻碍。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改进制裁的设计以及进行更广泛的国际执法合作来解决，但不应低估这些步骤的政治障碍。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应该从整体上判断制裁政策的有效性，而不是一次次具体实施制裁的有效性。我们知道，一些目标在受到威胁时会让步，但发出国必须愿意实施制裁，以维持其威胁的可信度（Morgan et al.，2009；Bapat et

al.，2013）。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情况下实施不成功的制裁可能是通过在其他情况下威胁实施制裁而取得成功的代价。此外，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有多少次人权没有受到侵犯，或有多少次核武器因为隐含的制裁威胁而没有得到测试。我们显然需要更好的工具来检验制裁的经济影响与政治成功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并需要改进方法以解决评估制裁效果的复杂性。

未来的问题和挑战

针对 2022 年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在范围和影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 WTO）的许多成员第一次对另一个 WTO 成员采取广泛和实质性的惩罚性经济措施。例如，根据条约（关贸总协定第 211 条）内的一项规则，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被取消，该规则允许 WTO 成员利用贸易限制来保护他们的“基本安全”利益。此外，对俄罗斯的制裁旨在破坏俄罗斯获得信贷和债务的机会，限制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人及其资产的流动性，并限制向俄罗斯出口的奢侈品和可能用于军事的双重用途技术/产品。鉴于私人利益的逃避、联盟伙伴的退让以及潜在的“破坏者”（如中国和印度，鉴于其规模和对全球事务的突出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很大）的可能性，美国还采取措施阻止联盟内外的不当行为——例如，威胁对违反者实施二次制裁，并承诺帮助缓解面临有限供应和能源成本上升的盟友的经济压力。

这些制裁会严重损害俄罗斯的经济吗？他们会促使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吗？它们能否阻止俄罗斯——或者更广泛地说，阻止其他国家在未来使用军事手段追求地缘经济目标？经验表明，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给俄罗斯、这些发出国和几个第三国带来高昂而持久的经济成本。此外，这些制裁造成的未来成本的规模大小是非常不确定的，而且可能非常大。然而，这些代价不太可能促使俄罗斯结束目前的军事行动，至少不能直接导致目前的军事行动的结束——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俄罗斯的军事补给，可以想象，制裁可能有助于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取得成功。

最后，我们希望就现代制裁的应用提出几个更广泛的问题，俄罗斯-乌克兰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问题也更普遍地来自制裁的持续演变。近几十年来，制裁演变的最大趋势是世界上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实施制裁，因为联合国成员国都可以被视为参与了制裁。随着制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各种联盟（如联合国、欧盟、非洲联盟等）也都在实施制裁，一组几乎被所有其他国家广泛关注的国家集团已经出现。这个群体近年来包括朝鲜、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朗，现在必须进行修改，以包括另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俄罗斯。这种情况下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对未来的制裁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一个起点，扩大使用制裁所造成的安全/国防威胁是否与军事武器破坏力增加所产生的威胁一样重要？美国财政部部长 Janet Yellen（2022）在近期警告说：“今后，将越来越难把经济问题与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更广泛的国家利益考虑分开。”为了增进我们对制裁及其影响的理解，我们必须建立能够解释军事和经济安全问题之间相互联系的模型。基于这些模型的分析可以寻求利用 Hirschmann（1945）的观点，例如，贸易可以作为一种权力的工具，并可以为发展关于制裁、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目标之间关系的宝贵见解提供可行的基础。

目前正在沿着这些方向进行一项新的研究工作。现有的文献表明，基于竞赛的模型可能会被有效地用于这个问题。对这些文献的重要贡献包括 Powell（1993），他建立了一个“枪与黄油模型”来研究和平作为马尔可夫完全均衡的出现，Skaperdas（1992）、Hirshleifer（1995）和 Grossman and Kim（1995）强调了不完全产权的重要性，并在一般均衡环境中实施冲突。Garfinkel et al.（2015）强调了贸易和安全之间的联系，探讨国家间对不安全资源（如领土）竞争的重要性，并表明贸易如何通过其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影响，影响冲突的强度和福利。本着类似的精神，Garfinkel et al.（2020）研究了“大型”贸易伙伴及其政治关系（敌人或朋友）之间的国际贸易如何制约他们的武装动机。甚至最近，在 Hirschmann（1945）贡献的激励下，Garfinkel et al.（2022）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捕捉到了贸易收益——可以直接用于武装和储蓄——之间的联系——以展示不安全、冲突预期和资源分配如何影响权力和贸易的预期收益。这项工作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解是，较大经济体的安全往往会受到侵蚀，因为它们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因此它们对武装的相对激励）往往相对较小。类似地，Camacho et al.（2022）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解释国家安全考虑是如何可能削弱各国分享或采用军事、两用和民用技术的意愿。通过揭示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的联系，这类研究也可能有助于弥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制裁方面理解的差距。

制裁（包括经济和安全后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也强调了了解目标国如何应对制裁的重要性。作为最终涉及的问题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当美国和西欧针对俄罗斯在 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而对其实施制裁时，俄罗斯以代价高昂的反制裁作为回应，导致西方许多国家要么取消自己的制裁，要么通过执法不严破坏联盟的制裁（Bapat and Kwon，2015；Miromanova，2021）。显然，普京在 2022 年发生俄乌冲突之前就有可能预料到类似的结果。这种情况强调了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就像发出国正在试验如何更有效地实施制裁时，目标国也在试验如何应对制裁。

最后，当各国寻求减少其对制裁的脆弱性时，这将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产生什么后果？例如，当世贸组织成员将贸易和安全政策混合在一起时——就像俄乌危机中那样——WTO 的生存和基于规则的政策制定方法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著名官员的评论表示，美国和欧盟可能已经在从全球多边主义转向与有限的朋友圈的合作。用 Janet Yellen（2022）的话来说：

“我们需要使我们用于建立贸易一体化的多边方法现代化。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自由但安全的贸易。我们不能允许一些国家利用其在关键原材料、技术或产品方面的市场地位来破坏我们的经济或行使不必要的地缘政治杠杆。所以，让我们继续深化经济一体化……并且让我们与那些可以信赖的国家一起做。我们倾向于将供应链外包给大量可信赖的国家……将降低对我们的经济和我们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的风险。”

本着同样的理念，欧洲央行行长 Christine Lagarde（2022）说：

“俄罗斯发起的战争引发了我们对全球化经济中经济关系和依赖关系的根本性重新评估……今天，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意味着我们的全球经济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已经看到全球贸易中出现了三个明显的转变。这就是从依赖到多样化、从效率到安全以及从全球化到区域化的转变。”

俄罗斯和中国等竞争国，以及印度等“友好”但不结盟的国家，也已开始寻找将其经济从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分离出来的方法。其中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坚持要求用卢布支付其天然气出口的费用（Hetzner，2022）。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正努力将人民币确立为跨境交易的主要货币。如果这些国家过渡到无需依赖美国机构或美元来开展业务，美国的经济实力将会减弱，其制裁政策的有效性将会受到削弱。

加强制裁效力的积极努力——特别是扩大使用二级贸易制裁和美国在制裁中主张域外管辖权的做法——也使国际关系紧张，即使是在长期盟友之间也是如此。欧洲国家对美国执行其对欧洲公司的制裁和财务报告法表示不满，特别是对与非美国企业开展的业务。

虽然多边制裁更加有效，但“胁迫”盟友配合制裁政策的努力可能会破坏联盟的基础。讽刺的是，美国利用其经济实力来支持其制裁政策的努力很可能会损害其军事和经济联盟——包括北约联盟的团结和世贸组织的凝聚力——这些都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特权地位的主要支柱。这些关系是非常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相比之下，我们对制裁现有理解的核心模型通常被认为是将制裁视为二元的，即有一个发出国和一个目标国。然而，即使我们认识到发出国可能是一个国家联盟，我们通常也会假设，至少隐含地假设，联盟的动力是外生的，并且是在与目标国进行讨价还价之前形成的（一个明显的例外，见 Miers and

Morgan，2002）。我们对制裁相关理解的进一步发展可能需要建立能够解释国际联盟的形成和多边谈判的复杂性的模型。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制裁之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仍在努力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制裁是否是外交政策的一种有效工具。这使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更加令人生畏。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制裁过程，我们必须承认其复杂性。我们还必须努力提高我们对经济与政治之间联系、多边谈判的复杂性、政策工具（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和制裁）的替代或互补程度、一次制裁事件的行为和结果如何影响未来事件的期望，以及随着事件的发展，制裁的动态变化的相关认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制裁的理解将十分具有挑战性，但最近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充分地说明了我们为什么应该做出努力。

本文原题名为“Economic Sanctions: Evolution, Consequences, and Challenges”。作者 T. Clifton Morgan, Constantinos Syropoulos, Yoto V. Yotov。Clifton Morgan 是莱斯大学阿尔伯特·托马斯政治学教授。Constantinos Syropoulos 博士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的受托教授。Yoto V. Yotov 是德雷克塞尔大学 LeBow 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和 ifo 研究所国际经济中心（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研究教授。本文是 2023 年 2 月发表于经济展望的研究文章。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 1983 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 28 个国家的 237 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 是 CEPR 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IfW Kiel)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简介：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是一个研究全球经济事务、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教育的国际中心。该研究所尤其致力于为全球经济事务中的紧迫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基尔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预测、经济政策咨询、出版物、全球解决方案倡议、科学教育和公共关系。该研究所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向政策、商业和社会决策者提供咨询，并向更广泛的公众通报国际经济政策的重要发展。

网址：https://www.ifw-kiel.d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CGD）全球发展中心

简介：CGD 位于美国华盛顿，是一独立的非营利性思想库，通过严谨的研究及与政策集团的积极性接触，鼓励美国及其他富裕国家进行其政策的改变以减少全球的贫困和不平等现状。

网址：https://www.cgdev.org/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简介：NBER 建立于 1920 年，是一个私人的、非盈利、无党派分歧的研究机构，专注于更好的理解经济运行状态。NBER 决心致力于在经济政策制定者、商业专家和科研院所之间传播无偏的经济研究。

网址：https://www.nber.org/